臺灣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黃　美　娥*

摘　要

「臺灣文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從九〇年代末期進入教育體制迄今，相關系所雖然陸續成立，但關於知識系統的建置，其實不斷面臨挑戰。從最早什麼是「臺灣文學」的定義探問、學科知識系統內容的摸索，到面臨文學史編纂書寫問題，以及遭受質疑致力追求本土化的知識特徵，是否會流於狹隘與侷限，如何可以快速達到國際化目標？尤其，學科當初得以建立，也得力於國家權力的協助與推波助瀾，遂使體制化過程，充滿文學政治的尷尬，保護傘下的教育生產，實際存有雙面刃危機，連帶致使臺灣文學知識體系的建構，在具備「發現臺灣」的自覺性的同時，卻也弔詭地一開始就得背負著「先天不足」的悖論。對此，隨著研究人力的投入，二十餘年來的學術累積成果，已經充分證明學科存在的必要性及其發展價值，本文即針對箇中概況加以簡介評述。而在論述時，係以葉石濤經典著作《臺灣文學史綱》(1987)為基點，試圖追索在此之後學界所做的各種努力面向，包括：整體研究深化與拓展、新興研究議題、研究熱點與亮點，以及詮釋框架、方法論和研究邊界擴大情形，從中可知臺灣文學學科如何從本土、在地研究，設法延伸、介入東亞和世界的成長軌跡。

關鍵詞：臺灣文學、文學知識系統、東亞、世界、研究邊界擴大

* 黃美娥，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現亦擔任臺灣文學學會理事長。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曾任臺大臺文所所長、北京師範大學和廈門大

** 關於本文內容，或取自個人已出版的研究成果，或源於 2008 年以來為中研院臺史所「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會議所寫論文所得，或屬本次新撰，特此說明。

學客座教授，另曾獲巫永福文學評論獎、竹塹文學評論獎首獎、臺灣文學年鑑焦點人物等。學術專長為臺灣文學，兼涉新舊雅俗範疇，同時關注臺灣與東亞文學關係研究。著有《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編有《世界中的台灣文學》、《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文學作品目錄》、《臺灣原住民族關係文學作品目錄 1603-1945》等。

黃教授現為漢學研究中心指導委員、《漢學研究》編輯委員，曾數度參與漢學研究中心主辦之閱讀推廣系列講座，受邀主講「踏查、旅行與臺灣認識論——閱讀《裨海紀遊》的幾種方法」、「愚民處苦久遂忘——賴和的哀傷與思考」等；亦擔任過本中心主辦獎助學人「寰宇漢學講座」之主持人。並有大作刊登於《漢學研究》和《漢學研究通訊》。2020 年獲致國家圖書館「臺灣各大學學術資源能量風貌」文學研究專書高被引排序第一。

一、前　言

九〇年代對於「臺灣文學」而言，是值得特別記憶的時刻。不僅學界如火如荼展開區域文學研究，當時文建會和文化中心也積極調查各地文藝資源，或努力編纂作家作品集，表現出對於本土、在地文學的熱情關切；而另一方面，為了爭取在高等教育體制中設置相關學科，社會各界和大學院校也相繼動員、發聲，最終如願以償。先是淡水工商管理學院（今真理大學）於 1997 年成立臺灣文學系，接著 2000 年又有成功大學創設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2002 年增設博士班和大學部，在國立大學拔得先河，以後則是花開遍地的局面了。

回顧臺灣文學學科的出現，其實歷經了一番艱辛的奮鬥過程，箇中情形藉由羊子喬主編《臺灣主體的建構：臺灣文學系所誕生》（高雄：春暉出版社，2011）所收各界發言、論辯資料，[1] 以及筆者為臺北市立文獻委員會策劃、主持，後刊於《臺北文獻》「臺灣文學學科體制化的回顧與思考」座談會紀錄，多位臺灣文學系所創辦人的回憶說明，便可略知梗概。[1] 不過，從九〇年代學科體制化迄今，臺灣文學研究系所雖然陸續成立，但關於知識系統

1　文刊《臺北文獻》季刊直字號 190 期（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14），頁 1-61。

的建置，卻仍不斷面臨各式挑戰，從最早什麼是「臺灣文學」的定義探問、學科知識系統內容的摸索，到面臨學生課程學習文本、閱讀材料選擇和文學史編纂書寫等根本問題，以及遭受質疑致力追求本土化的知識特徵，是否會流於狹隘與侷限？如何才能快速與世界接軌，達到國際化目標的壓力？後來還有在臺馬華文學歸屬問題，或近期出現的「華語語系文學」熱潮，早已耳熟能詳的「東亞研究」論，以及先前出現過的「民國文學」等話題，莫不牽涉臺灣文學研究對象界定與學科涵蓋層面的反思。

上述所論，攸關「臺灣文學」學科邊界的劃分，尤其種種問題並非逐一發生，長久以來更以重層、併置的姿態存在著，遂使臺灣文學的學科內涵顯得糾葛複雜。不過，也正因為持續不斷而來的挑戰與刺激，無形中裨益臺灣文學學科保持時刻反省和敏銳思考的狀態，並以此尋找更上層樓的新動力。換言之，隨著二十餘年來的發展，臺灣文學學科已然展現出一段深耕茁壯後的動人景緻。那麼，關於臺灣文學研究的發展情形，迄今有何進展與變化？或許一個最簡便的觀察的方式，可以經典著作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1987）為基點，繼而追索在此之後學界所做的各種努力面向，這將有助於發現臺灣文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如何從本土、在地研究，設法延伸、擴大介入東亞和世界文學論域的成長軌跡。

二、臺灣文學知識系統的深化與拓展

關於臺灣文學研究的進展故事，應當從何說起？循著文學史長河分段追溯，自是一個策略。但，源頭、開端以及邊界情形如何？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係以沈光文為始，唯如此實缺乏原住民文學視角；再者，如費德廉（Douglas L. Fix）、羅效德曾經編譯出版《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臺北：如果出版社，2006），或是李加展編撰《十七、十八世紀歐洲文獻檔案之福爾摩沙文學考》（唐山出版社，2007），都提醒著可將臺灣文學史的觸角，擴及歐洲西文作品，而這也是目前文學史匱乏的一面。亦即，國內學界有關臺灣文學史的探索，慣見敘述模式仍然依循明鄭、清領、日治到戰後此一歷史發展時序，並且側重於漢人文學表現。

儘管如此，因本文所論重點乃在於現有研究成果的評述，[2] 故以下仍會沿用常見模式進行介紹，並以日治時代為界，分由戰前與戰後兩階段來考察。唯，在此之前，會先就原住民族文學研究概況略作說明。

（一）原住民族文學研究

關於原住民族文學，此一範疇在葉氏《臺灣文學史綱》原被忽略，但早在 1980 年代「還我土地」、「還我姓名」等原住民社會運動推展時，已有找尋原住民文學主體的呼聲；進入九〇年代，孫大川多次談論原住民文學的「可能」，[3] 浦忠成更嘗試寫下〈臺灣原住民文學概述〉。[4] 到了 2003 年，孫氏主編《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評論卷（上、下）（印刻出版社）時，就蒐羅了多位原、漢學者之作，包括瓦歷斯．諾幹、傅大為、廖咸浩、彭小妍、陳敬介等人論述，顯見經過原、漢學者的努力，成果日增。之後最為重要的著作，當屬 2009 年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獨力完成的《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里仁），該書雖名為「史綱」，篇幅卻是近七十萬字的鉅著，上冊為卷一「口傳文學時期」，下冊為卷二「使用文字之後的原住民文學」。由於原住民族文學，最初傳播型態依賴口耳相傳，想要予以系統化表述，甚至掌握各族精粹特點，以及兼顧文學「史」重視時間進展演變的敘述方式，實屬不易；更何況，還要從「口傳文學時期」，觀察到後來「使用文字後的原住民族文學」。尤其，隨著時代前進，作家作品數量倍增，同時還得面臨當代民族主義覺醒之後，原住民族文學如何與臺灣文學之間進行史觀協商的挑戰，這使得撰寫原住民族文學史成為一樁難為之事。正因如此，本書作為國內第一本臺灣原住民族的文學史，自然具有重大意義。

作為原住民族文學主體建構實踐的重要著作，作者在成書之後，強調不宜貿然將原住民族文學納入「臺灣文學」範疇，否則會窄化原住民族文學，

2 受限於時間與精力，以及本文篇幅，將研究對象僅鎖定國內學者，而海外著述或曾於國內翻譯出版者，除非特殊需要，將不另作介紹。又，臺灣戲劇研究，本文未納入討論範疇，特此說明。

3 孫大川，〈原住民文化歷史與心靈世界的摹寫——試論原住民文學的可能〉，《中外文學》21.7 (1992.12): 152-178。

4 浦忠成，〈臺灣原住民文學概述〉，《文學臺灣》20 (1996.10): 190-202。

以為可與世界原住民族文學放在同一類的範圍去思考，於此可見作者史觀。[5] 不同於浦氏想法，2011 年劉秀美《從口頭傳統到文字書寫：臺灣原住民族敘事文學的精神蛻變與返本》（文津），所論亦是原住民口傳文學與作家文學，但全書係從臺灣文學立場著眼。書中最引人注目之處，在於針對口傳文學進行研究嘗試，例如以排灣、魯凱族日卵生人神話去考究口傳文學的社會基礎，或是深究臺灣各族系洪水神話中的系統區別、族源關係、區域情境，甚至面對現代原住民作家文學，也特別留心相關元素，成為極大特色。

到了 2013 年董恕明《山海之內天地之外：原住民漢語文學》（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則著重原住民漢語文學發展輪廓及其創作面向的介紹，所析包括「從街頭到案頭」、「從山林到海洋」、「從柴米油鹽到落地窗前」、「山海之內天地之外」，透過章節標題可以得知書寫議題與寫作旨趣。同年，尚有魏貽君出版《戰後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形成的探察》（印刻，2013），作者不採取常見的「一九八〇年代初期的世界原住民文化復興運動→臺灣的黨外民主運動→原住民族文化復振運動→原住民族文學」線性史觀去描繪原住民族文學的形成脈絡，他針對「共構入史」與「自築入史」與浦忠成所言的「第四世界文學」說法，點出可能侷限，認為原住民文學或原住民族文學，在臺灣的發展不盡然只是族群性、民族性的內在趨力使然，更是受到社會性影響的文學類型。至於 2018 年楊翠《少數說話：臺灣原住民女性文學的多重視域》（上）（下）（玉山社），作者在上冊先就臺灣原住民女性文學進行宏觀勾勒，次而剖析原住民女性作家有關現代詩、家族史書寫、故鄉離返敘事、飲食文學的創作情形；下冊從女性主體認同、記憶研究、政治思想、草根實踐、原運運動等議題著手，凝視原住民女性與自身、家庭、族群、社會的互動關係，並採用比較方法，觀察與西藏、臺灣漢人女性作家相近題材的書寫表現，所論包括董恕明、伍聖馨、明夏、綢仔絲萊渥、里慕伊．阿紀、阿鴿、麗依京．尤瑪、阿綺骨、伊苞等人作品，裨益臺灣原住民族女性作家身影與心聲，獲致全面評述，自是彌足珍貴。

在學位論文方面，陳芷凡「跨界交會與文化『番』譯：海洋視域下臺

5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臺北：里仁書局，2009），頁 34。

灣原住民記述研究（1858-1912）」（政大中文所博論），回溯跨越海洋而來的中國、西方與日本有關臺灣原住民的記述文字，除了說明各時期、各類型的原住民認識論外，還仔細挖掘外界與臺灣原住民間的異己關係，又因受到曹永和「臺灣島史」觀點啓發，故特別留意海洋的流動性與介面性作用，關注其間所引發的與臺灣原住民的跨界接觸與文化「番」譯現象，是以能夠展現多維度的辯證意涵。其次，劉智濬「認同．書寫．他者：1980 年代以來漢人原住民書寫」（成大臺文所博論），探討 80 年代以來漢人撰寫的大量原住民書寫，文章將之視為漢人自我認同需求與想像慾望的投射轉化，亦即漢人自我鏡像顯現，通篇就在此一新穎的詮釋框架下展開；結果發現漢人從強勢者、欺凌者、關懷者、啓蒙者、贖罪者，到變成認同者、回歸者、渴慕者與朝聖者，則原／漢鏡像關係的複雜演變，實際成為臺灣漢人國族想像與身份認同更迭狀態的反映，這為臺灣主體認同研究帶來啓發。再如蔡佩含碩論「社會介入．自然寫作．歷史敘事——以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為考察對象（1970 ～）」（清大臺文所碩論），此文關注原住民族漢語文學有關「社會介入」、「自然寫作」與「歷史敘事」三個層面的書寫，除了歸納相關創作演變概況，還進一步與臺灣文學史相關題材和類型文學連結觀看，例如「自然寫作」、「大河小說」，發現存有共構或顛覆之處，有利更多思考。

另外，關於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族文學，浦忠成發表於 1998 年的〈原住民族發展的幾回轉折——由日據時期以迄現在的觀察〉，[6] 嘗試要將日治時期原住民族受教菁英之日文書寫，納入文學史脈絡考察。而相對於此，也有研究者注意到當時日本警察，其實留有許多文獻作品可資討論，例如，簡中昊〈日治初期警察官眼中的臺灣原住民形象——以〈生蕃探險記〉為例〉，[7] 以連載於《太陽》雜誌中，山地警察所寫〈生蕃探險記〉為分析文本，彰顯日治初期日人對於臺灣原住民的認識情形。再如，溫席昕《日治時期在臺日本警察的原住民書寫：以重要個案為分析對象》（秀威，2016），留意明治到昭和時期「理蕃警察」群體的存在事實，並且關切他們因與原住民近身接

6 浦忠成，〈原住民族發展的幾回轉折——由日據時期以迄現在的觀察〉，收入孫大川主編，《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評論卷（上），頁 95-124。

7 簡中昊，〈日治初期警察官眼中的臺灣原住民形象——以〈生蕃探險記〉為例〉，《臺灣文學研究》6 (2014.6): 195-228。

觸，其所創作生產的心得觀察、治理思考與文學書寫。當然，如果要把日本警察所寫作品納入原住民文學範疇之列，便會牽涉到原住民文學的界定在於「題材」或「身份」的問題。不過，誠如前面研究所示，無論是鏡像研究或比較研究，所得都可能超過想像。那麼，回顧日治時代報刊中，不同身份者所寫大量有關原住民的漢文、日文作品，或許會有新的發現與體會。[8]

（二）日治及其以前階段論

簡介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研究概況之後，以下將以斷代研究方式，評述各階段研究成果情形，並分由新、舊文學兩方面加以說明，再兼及通俗文學。

1. 古典文學方面

要論及臺灣古典文學研究的階段論，自然該由明鄭文學研究入手，只是隨著相關研究者詮釋框架與論述史觀遞變，也形構出不同的文學風景。首先，陳昭瑛〈臺灣詩史三階段特色〉、〈明鄭時期臺灣文學的民族性〉二文，[9]將明鄭文學視為臺灣文學之始，且認為日後不論遺民文學、鄉愁文學、鄉土文學皆濫觴於此，突出了明鄭文學在臺灣文學史上的起點和影響意義。她引用連橫《臺灣通史．藝文志》說法，強調明鄭文學充滿抗爭民族性，但也指出本島異於內地南明文學者，是在眷懷故國之外，寓有不歸之思和發現臺灣的熱忱，以上所述為明鄭在臺文學特徵定下基調。施懿琳〈後殖民史觀詮釋臺灣古典文學的一個嘗試——以明鄭時期臺灣詩為分析對象〉，則從後殖民立場出發，以「殖民性格」形容鄭氏王朝，對於鄭成功及相關明鄭在臺詩人與詩作．做了不同以往的解讀。[10]其後，王德威〈後遺民寫作〉[11]

8 2013 年，筆者受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主編《臺灣原住民族關係文學作品目錄（1603-1945）》（上）、（下）和《臺灣原住民族關係文學作品選集（1603-1894）》、《臺灣原住民族關係文學作品選集（1895-1945）》，其中便有大量詩歌、小說與散文作品的作者身份出自漢人與日人。

9 二文收錄於陳昭瑛，《臺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臺北：正中書局，1998）。

10 施懿琳，〈後殖民史觀詮釋臺灣古典文學的一個嘗試——以明鄭時期臺灣詩為分析對象〉，收入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主編，《臺灣文學史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春暉出版社，2008），頁 285-326。

11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收入氏著，《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7）。

於臺灣風起雲湧的後殖民研究風潮中，選擇重探遺民意識。他與陳昭瑛相同，發現以明鄭為依歸的遺民意識，是清代臺灣論述中時隱時現的幽靈，確有文學傳統的承繼性，但更注意乙未割臺之後，因為遺民觀念與現代性的遇合，遺民論述因此有了繁複的姿態，其所關注的焦點包括朝代的、種族的、國家的、文化的、地域的，乃至於時間的遺民，這相較先前陳氏所謂明鄭文學的抗爭民族性格論更為多樣性。另外，魏亦均「漢字文化圈的板塊位移與知識重構：島／國視域下臺灣文學的轉向與明／鄭文學的生成」雖是碩士論文（臺大臺文所），卻有新的史觀嘗試。他將一般所謂「明鄭時期」，或往前或往後，置入南明、明鄭、鄭氏王朝，以及臺灣島嶼和東寧王國，臺灣與金門、廈門的「閩臺關係」等多元時空脈絡中，亦即透過「明／鄭文學」的生成游移過程，使明鄭臺灣文學更為動態化；再則強調因為許多漢文人的到來，臺灣開始進入東亞漢字文化圈，藉此賦予明鄭臺灣文學在「遺民文學」之外的新定位和新意義。

清領時期方面，吳毓琪「康熙時期臺灣宦遊詩之研究」（成大中文所博論），對於清領初期來臺宦遊詩歌書寫情形有所爬梳；許惠玟「道咸同時期（1821-1874）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中山中文所博論），所論是臺灣本土文人較具成熟表現階段的探索。以上，可知採用「階段」分期討論方法，曾是清領時期臺灣古典文學研究的趨向之一，而「宦遊」和「本土」則是考察清領臺灣文學重要的探索向度。除了詩人、詩作的考察之外，余育婷《想像的系譜：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建構》（稻鄉，2012），旨於探討清代臺灣本地詩歌「如何生成」的問題，進以建構清領時期臺灣詩學體系。林淑慧《臺灣清治時期散文的文化軌跡》（臺灣學生書局，2007），分由前期旅遊巡視書寫、中期社會教化書寫、後期議論時事書寫，顯現清代臺灣散文創作面貌。他如游適宏《以賦憶賦：清代臺灣文集賦的仿擬與記憶》（文史哲，2014），主要探討臺灣賦相關問題，指出臺人模仿鮑照之賦情形和《少嵓賦草》對臺影響，並舉出臺灣賦有「題聚一唐」現象，此可和「清代臺灣詩壇不分唐宋」的認知，相互對話。

再者，受惠於人文地理學與旅行理論的啓發，有不少研究選由地方認同、地景空間、旅行視角進行探討，如申惠豐「臺灣地方意象的表現：明鄭與清領時期（1651-1895）來臺文人的空間書寫」（成大臺文所博論）、李知

灝《從蠻陌到現代：清領時期文學作品中的地景書寫》（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等。不同於上述偏於臺灣地景空間的考掘，王建國〈政治書寫與歷史衍異：清代臺灣寧靖王與五妃題詠現象及其詩作論析〉一文，[12] 注意明鄭歷史與清領時期詩歌創作發展變化的關係，發現官方方志系統和朱一貴事件的影響作用，為五妃題詠數量凌駕寧靖王題詠做了說明。其他，關於清領時期的文人個案研究，陳益源《蔡廷蘭及其海南雜著》（里仁，2006）針對澎湖文人蔡廷蘭漂流冒險越南的奇特際遇，進行移地考察與文獻研究，除造訪蔡氏金門祖籍地、澎湖出生地、臺南任教地、越南漂泊地和江西仕宦地，並收集相關傳說，比對所記越南民俗，介紹多國譯本，所論出色。

日治時期的古典文學研究方面，有幾本專書值得重視。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巨流，1999），試圖貫串清代到日治時期詩歌創作概況，在作者類型、階層轉變和創作表現闡述之外，又從自然與社會、時／事與社會面向入手，且由中國漢詩傳統凝視臺灣古典詩歌之近似、殊異與特色，別具價值。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以重要作家、作品和社群為例，勾勒臺灣古典文學各期面貌，並對賴和漢詩、吳德功國族認同精闢分析，且於書中揭示古典文學研究未來方向，[13] 尤具指引金針之效。翁聖峰《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五南，2007）藉由590 篇文獻清楚釐析臺灣新舊文學論戰之始末與論點爭執所在，明確指出論戰發生實根源於不同文化意識，並非單純文學典律之爭，另書中揭舉臺灣創作「文體」風格殊異多元，裨益臺灣文體研究。余美玲《日治時期臺灣遺民詩的多重視野》[14] 細膩刻劃乙未割臺後的遺民文人離散心境，並考察相關作品與中國遺民思想傳統、屈騷傳統、杜甫詩史精神的承繼與變化關係，能兼顧遺民文化精神與遺民詩歌美學之闡發。再如筆者《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

12 王建國，〈政治書寫與歷史衍異：清代臺灣寧靖王與五妃題詠現象及其詩作論析〉，《漢學研究》31.3 (2013.9): 103-136。

13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頁 15-17。

14 余美玲，《日治時期臺灣遺民詩的多重視野》（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另外，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同樣關注遺民精神世界，雖非專為臺灣文學而發，但其中第四章論述臺灣漢詩譜系與遺民詩學的結構性起源，也有言及王松、洪棄生等人，值得參看。

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麥田，2004），針對過去新舊文學二元對立的斷裂史觀提出商榷，將日治時期的臺灣視為一個全球化下的新興文化場域，觀察進入二十世紀後，現代情境如何促使本地傳統文人形塑出新感覺意向與新自覺姿態，書中透過文體、思潮、社群、作品、文化主體、國族政治等面向加以分析，指出現代性在臺灣，有著傳統／現代、本土／世界、同化／反殖的重層糾葛鏡像。林淑慧《旅人心境：臺灣日治時期漢文旅遊書寫》（萬卷樓，2014），主要探討日治時期漢文旅遊書寫相關問題，透過爬梳報刊中的遊記或旅遊敘事和個人遊記，將臺人在日治時期前往中國、日本、世界和島內旅行的內在心理、感官視覺、文化流動、跨界翻譯、文學再現、敘事策略問題，做了詳細鋪陳。又如梁淑媛《飛登聖域：臺灣鸞賦文學書寫及其文化視域研究》（五南，2012），書中針對臺灣鸞賦、鸞堂的空間性，以及不歌而誦、藏名隱曲、多音性與遊觀敘事，鸞生與煙花文化議題等加以探討，展現賦與宗教交涉的豐富面貌，有利獲見賦在臺灣的有趣發展。

此外，由詩人社群集結而成的「詩社」及其相關研究，亦是古典文學研究的重要議題。以三大詩社「櫟社」、「南社」與「瀛社」而言，均有相關討論，其中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國立編譯館，2006）內容涵蓋多元，書中首就櫟社文學史料的蒐集概況予以陳述，繼而說明臺大圖書館館藏詩稿，以及櫟社與鹿港淵源，若干社員詩歌、詩意與詩心等，剖析深入，關照全面。知名詩社個案研究之外，陳欣慧「『詩』的權力網絡：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碩士論文（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所），運用布爾迪厄場域理論，梳理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發展歷程與文學表現，並考掘兩社動員各式漢詩資本時，權力秩序或顯或隱的過程，得以一窺詩歌政治與社會權力的互動關係；謝崇耀《日治時期臺北州漢詩文化空間之發展與研究》（稻鄉，2012），以「漢詩文化空間」詮釋視域，進行日治時期臺北州傳統詩社的統合研究，論及詩人、詩學技藝、詩社、地理空間的共構性，亦有新意。至於筆者亦有數篇論文針對詩社研究而發，其一〈實踐與轉化 —— 日治時代臺灣傳統詩社的現代性體驗〉，[15] 乃以「現代性」角度說明日治傳統詩社如何轉變成為「新」的

15 黃美娥，〈實踐與轉化 —— 日治時代臺灣傳統詩社的現代性體驗〉，收入氏著《重層現

漢文想像共同體，以及現代社群集體意識的達成、詩社社群公共場域的建立、傳統詩社與現代日常休閒娛樂生活的交匯、詩社新運作模式和新題詩寫作等；其二〈日、臺間的漢文關係：殖民地時期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重構與衍異〉，[16] 留意殖民地時期日本官方如何透過「風雅論」的詩教話語，對於臺灣詩社展開文化統合和馴化；其三〈在「同」與「不同」之間——「玉山吟社」的詩歌空間意義與社群文化生產〉，[17] 討論臺灣與日本漢詩社之間「同與不同」的關係和現象。以上，均屬新視角的考察。

在上述之外，研究焦點尚有報刊、詩話、文言通俗小說、臺日漢文關係研究等，後二者在晚近學界受到重視。以通俗小說而言，首先得歸功於下村作次郎、黃英哲在 1998 年出版《臺灣大眾文學》，引發注意白話通俗小說的風潮，而當時另有關注 1930 年代《三六九小報》、《風月》、《風月報》小說文言創作情形者。但，實際上早從 1905 年起，謝雪漁、李逸濤、魏清德等人，便已嘗試書寫偵探、言情、神魔、武俠等類文言通俗作品，筆者於 2003 年率先撰文討論；[18] 稍後呂淳鈺碩論「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的發生與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類的考察」（政大中文所）亦觸及古典文人偵探作品，此文也是第一篇研究日治時代偵探小說文類的學位論文。又，前述創作尚可與徐坤泉、吳漫沙的白話通俗小說併觀比較或連結，如此將有助於一探從「文言」到「白話」的通俗小說生成狀態，因此別具意義。

晚近十餘年來，隨著此一領域漸獲矚目，耕耘者日多。相關研究成果不少，例如筆者〈「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19] 論及日本漢文小

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4），頁 143-181。

16 黃美娥，〈日、臺間的漢文關係：殖民地時期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重構與衍異〉，《臺灣文學研究集刊》2 (2006.11): 1-32。

17 黃美娥，〈在「同」與「不同」之間——「玉山吟社」的詩歌空間意義與社群文化生產〉，收入衣若芬主編，《東張西望：文圖學與亞洲視界》（新加坡：八方文化，2019），頁 205-220。

18 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臺灣通俗小說的女性形象——以李逸濤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作品為討論對象〉，宣讀於政治大學中文系主辦「二十世紀臺灣男性書寫的再閱讀——完全女性觀點學術研討會」，2003.10.18-19。

19 黃美娥，〈「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

說對於臺灣漢文小說敘事成規、創作美學風格與文體書寫範式的啓發作用，涉及了臺灣小說史的起源論問題。阮淑雅「中國傳統小說在臺灣的續衍：以日治時期報刊神怪小說為分析場域」（政大中文所博論），著重考究中國傳統小說在臺灣的續衍情形，可見臺灣小說與中國小說之間的密切淵源。再如林以衡《日治時期臺灣漢文俠敘事的階段性發展及其文化意涵：以報刊作品為考察對象》（國立編譯館，2007）、《東、西文化交錯下的小說生成：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東亞／西洋小說的接受、移植與再造》（稻鄉，2019）二書都以文言／通俗小說為分析對象，前者是首部介紹日治時期臺灣武俠小說的專書；後者則在闡述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如何在東、西文化和文學交互影響關係下的生成、摹寫與再造，更能掌握與世界文學／文化的交涉關連。此外，尚有薛建蓉《重寫的「詭」跡：日治時期臺灣報章雜誌的漢文歷史小說》（秀威，2015），專就歷史小說此類作品加以剖析，尤其留意箇中受到日本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影響的軌跡；柯榮三《雅俗兼行：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概述》（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除了介紹兩大通俗雜誌《三六九小報》、《風月報》系列雜誌，另也評介李逸濤、魏清德、謝雪漁、許丙丁、鄭坤五等文言作家與作品，以及徐坤泉、吳漫沙二位白話名家之書寫，展現文白雙管齊下的企圖。其他如許俊雅，亦有考究臺灣小說文本來源與版本變異等文。

至於「臺、日漢文關係研究」方面，有鑑於殖民地時期日臺之間存有「同文同種」情境，那麼該如何闡述兩造之間的漢文多重脈絡關係？早期學界多強調差異／對抗的後殖民論述，後來則有取徑現代性、語言政治和文化統合論者，考察面向包括：儒學、語文教育與日本國體論的關係，[20] 以及日臺漢詩文的「同文」和「不同調」現象等。[21] 上述研究指出漢文的「中介」

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漢學研究》28.2 (2010.6): 363-396。

20 如陳培豐，〈殖民地臺灣國語「同化」教育的誕生——伊澤修二關於教化、文明與國體的思考〉，《新史學》12.1 (2001.3): 115-155、〈重新解析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同化』國語教育政策——以日本近代思想史為座軸〉，《臺灣史研究》7.2 (2001.6): 1-49；川路祥代，「殖民地臺灣文化統合與臺灣傳統儒學社會」（成大中文所博論，2002）。

21 如柳書琴，〈從官製到民製：自我同文主義與興亞文學〉，收入王德威、黃錦樹合編，《想像的本邦：現代文學十五論》（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5），頁 63-90，她注意到「同文問題」在侵華戰爭爆發後如何促使臺人自我參與帝國主義的文化統合建構，出現文藝

角色及其潛藏的資源性，因此日、臺「同文」交混、差異問題，也由文字範疇邁向文學、思想範疇，不過所論大抵較集中於殖民統治技術的文化／文學政治顯影。到了陳培豐《想像和界線：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一書再展新意，他將向來被視為既定概念的「漢文」當成分析對象，考察臺灣語言文體在東亞漢字文化圈與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混成語現象」，藉以剖析殖民地時期臺灣各種漢文文體成立過程及背後意義。[22] 而不同於陳氏取徑「文體」研究，筆者則是全力鎖定「漢文學」議題，故多年來分別從詩歌、散文、小說、詩話著眼，以及留心來臺日人個案和詩社社群，循著「日本在臺漢文學史」、「殖民地時期臺、日漢文關係」、「臺、日、中漢文跨界接觸」的思考理路去摸索，陸續展開系列考掘工作。[23] 另如廖振富，曾就中村櫻溪遊記予以探討，[24] 後又協助國立臺灣文學館選注《在臺日人漢詩文集》（2013），並與張明權合撰〈明治時期《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日台漢文交流的多重意涵〉。[25] 再如莊怡文《在理想的幻滅中尋找生之路：小泉盜泉《盜泉詩稿》研究》（稻鄉，2018）、蕭惠文「臺、日之間的多重複寫：日本漢詩人籾山衣洲研究」（臺大臺文所碩論）、盛浩偉「多重文脈下的在臺日人漢文學：關口隆正及其書寫與時代」（臺大臺文所碩論）、涂小蝶「後藤新平的漢詩創作及其活動——以臺灣相關書寫為觀察核心」（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

自我異化的惡果。其後，陳培豐，〈日治時期的漢詩文、國民性與皇民文學——在流通與切斷過程中走向純正歸一〉，收入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編，《跨領域的臺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頁 457-498，進一步強調了日、臺漢文實是「同文」而「不同調」的關係，聲調差異說明了臺式「漢文」，終究無法承擔負載日本國民性、皇民文學的任務。

22 參見陳培豐，《想像和界線：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臺北：群學出版社，2013），書末旨趣簡介。

23 除前面已述小說研究外，又如〈跨界傳播、同文交混、民族想像：賴山陽在臺灣的接受史（1895-1945）〉、〈日、臺間的漢文關係：殖民地時期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重構與衍異〉、〈從「福建」看近代臺灣與東亞漢詩文的交涉互動意義——以《送米溪先生詩文》為分析場域〉、〈帝國漢文的「南進」實踐與「南方」觀察：日人佐倉孫三的台、閩書寫〉等。

24 廖振富，〈中村櫻溪北臺灣山水遊記的心映現與創作美學〉，收入朱歧祥、許建崑主編，《臺灣古典散文學術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11），頁 219-252。

25 廖振富、張明權，〈明治時期《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日台漢文交流的多重意涵〉，《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9 (2014.12): 145-189。

化所碩論）等，多篇學位論文亦鑽研於此，可供參考。

2. 新文學方面

關於日治時期新文學研究成果，在長期累積中自有研究熱點與亮點。首先，專書部分，施淑《兩岸文學論集》（新地文學出版社，1997）雖然出版於 90 年代末期，迄今仍屬經典，書中「輯一臺灣文學論集」，有關文協分裂、三〇年代文藝思想、左翼知識份子、新感覺派與頹廢意識、城市與鄉村文學的觀點探討，影響深遠。陳芳明《左翼臺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麥田，1998）、《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臺灣史觀》（麥田，2004），是研究日治臺灣新文學者的必讀之作，前者勾勒左翼文學發展背景與作家系譜，以及左翼精神與反殖民實踐情形；後者關注現代性與第一代作家關係，以及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之間的糾葛矛盾，同時也與臺灣史議題連結考索，展現通貫文史的宏觀視野。而同樣對於左翼和殖民主義問題感到興趣者，尚有游勝冠《殖民主義與文化抗爭：日據時期臺灣解殖文學》（群學，2012），此書關注日治時期傳統三種類型知識份子的文化立場，指出只有左翼知識份子由反支配的本土主義立場出發，才能真正扮演內部解殖的角色，此外也對賴和、張文環等作家的解殖文學表現作了清晰梳理和批判，突出了以文學為利器進行文化抗爭的動人面貌。再如柳書琴《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聯經，2009），與游氏之作旨趣近似，但留心的是旅日青年，焦點在於福爾摩沙集團。書中對集團成立發展過程交代詳盡，並對作家謝春木、王白淵、張文環、巫永福、吳坤煌的旅日處境與心靈狀態深入描繪，尤其注意與中國左翼作家東京聯盟、日本左翼作家和左翼詩壇往來情形，對臺灣左翼文學系譜與東亞左翼文學跨界關係研究，有其貢獻。又，在討論本土或旅日作家的文化抗爭、解殖行動之外，朱惠足《「現代」的移植與翻譯：日治時期臺灣小說的後殖民思考》（麥田，2009），以 1920 年代至 40 年代的臺人與日人小說文本為分析材料，一方面探討「現代」在日治臺灣文學發展中的跨界／移植／翻譯樣貌，指出臺灣的現代性移植經驗，是在西洋、中、日的「間隙」中形構；另一方面，因為重視移植經驗，故相較過去亦為臺灣小說後殖民思考所標舉的「本土論」，本書更強調了「在地化」經驗的齟齬、隔閡，或溝通、交流，展現不同視角的考察，別具意義。大抵，透過前述，可以一窺日治臺灣新文學研究要點，頗多集中於反殖民與文化抗

爭，或現代性與本土性關係性的摸索，或左翼文人與文藝思潮討論等。

其次，1930 至 1940 年代的文學階段論，也是研究者興趣所在。單以 2009 年來看，便有：蘇世昌「1920-1937 臺灣新知識份子思想風貌研究」（清大中文所）、趙勳達「『文藝大眾化』的三線糾葛：一九三〇年代臺灣左、右翼知識份子與新傳統主義者的文化思維及其角力」、李敏忠「殖民地風景的書寫：1930 年代臺灣白話小說文體風格研究」、陳淑容「戰爭前期臺灣文學場域的形成與發展：以報紙文藝欄為中心（1937-40）」（以上三篇均成大臺文所）、李文卿「共榮的想像：帝國日本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政大中文所）等博士論文進行研究。而由諸文內容看來，撰者在面對 1930 至 1940 年代的臺灣文學史時，切入角度不同，計有：新知識份子思想風貌討論、文藝大眾化問題探索、白話小說文體風格剖析、報刊媒體與戰爭前期文學場域生成、帝國日本與大東亞文學圈關係性闡述等。如此琳瑯滿目的分析向度，在共構、交錯、相異的研究框架中，得使該時期文學史內在結構與外在輪廓，獲致鮮明重現。再者，此一階段尚有白話通俗小說盛行情形，徐坤泉《可愛的仇人》、《靈肉之道》和吳漫沙《韭菜花》、《大地之春》等人作品深受歡迎，展現更為繁複多彩的文學場域。兩位言情作家不僅有學位論文進行研究，[26] 亦有林芳玫〈臺灣三〇年代大眾婚戀小說的啓蒙論述與華語敘事：以徐坤泉、吳漫沙為例〉、[27] 李進益〈日據時期長篇通俗小說的創作及主題探究——以徐坤泉、吳漫沙作品為主〉、[28] 林姵吟〈性別化的現代化：徐坤泉與吳漫沙作品中的女性角色〉[29] 等文，筆者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吳漫沙」卷時，[30] 已彙集重要相關研究。

---

26 例如吳舜鈞，「徐坤泉研究」（東海大學歷史所碩論）、吳瑩真，「吳漫沙生平及其日治時期大眾小說研究」（南華大學文學所碩論）。

27 林芳玫，〈臺灣三〇年代大眾婚戀小說的啟蒙論述與華語敘事：以徐坤泉、吳漫沙為例〉，《臺北大學中文學報》7 (2009.9): 29-66。

28 李進益，〈日據時期長篇通俗小說的創作及主題探究——以徐坤泉、吳漫沙作品為主〉，收入中興大學中文系編，《第三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2），頁 29-45。

29 林姵吟，〈性別化的現代化：徐坤泉與吳漫沙作品中的女性角色〉，《臺灣文學學報》25 (2014.12): 1-31。

30 《文訊》自 2011 年起，在國立臺灣文學館贊助下，由封德屏總策劃執行「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工作，迄今成果已超過 120 種，成為掌握現當代臺灣文學作家前行研

接著，則是作家個案研究情形，就中不能忽視的是林瑞明有關賴和的最早開拓，[31] 以及陳建忠《書寫臺灣，臺灣書寫——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春暉，2004）後來集大成討論，所論包括賴和各類新舊文學創作面目，從本土位置重新定位賴和作為「臺灣的魯迅」的角色和行動意義等。又如楊逵研究，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秀威，2009），因研究幅度夠跨越戰前與戰後，故能針對楊逵思想的銜承轉化進行細膩考掘，如楊逵三〇年代、戰時文壇與戰後初期的種種表現，以及與皇民文學、臺共之間的複雜糾葛關係，誠屬佳作。再如龍瑛宗研究，陳龍廷〈木瓜樹的小鎮：龍瑛宗小說再現的日治時期南投〉[32] 注意的是小說的虛構與真實，他參考《地理案內書》、日治時代臺灣地圖、臺灣地名辭書和照片，重讀〈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指出小說筆下正是 1930 年代的南投；林祈佑「『自我』的複調：中島敦、龍瑛宗與日本殖民地文學的表述機制」（臺大臺文所碩論），從比較文學視角，藉由討論日、臺名家中島敦與龍瑛宗的文學作品，解析殖民地文學的自我表述機制與限制；至於王惠珍的龍瑛宗考察最為重要，《戰鼓聲中的殖民地書寫：作家龍瑛宗的文學軌跡》一書（臺大出版中心，2014），歷經長期史料爬梳，注意作家 1937 年至 1947 年十年間之文學活動與創作概況，依據龍瑛宗移動場所的變化，逐一討論相關作品內涵、作家精神史樣貌，所得完整，是迄今最具代表性的專著。當然，個案研究的基礎，實得力於國立臺灣文學館或地方縣市政府單位的編輯成果，如陳萬益主編《龍瑛宗全集》、《張文環全集》、《呂赫若日記 1942-1944》，以及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等，[33] 均有貢獻。值得補述的是，過去較受爭議的皇民文學作家，[34] 陳采琪「跨時代的「皇民文學」作家——陳火泉研究」（清大臺文所碩論），試圖探索戰前、戰後陳火泉的創作面貌與相關評價，說明作家何以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文壇位置，未曾消逝在滾滾歷史洪流的

究極好的管道，且亦陸續建置成電子資料庫。

31 林瑞明，《臺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4）。

32 陳龍廷，〈木瓜樹的小鎮：龍瑛宗小說再現的日治時期南投〉，收入彭瑞金編，《2015 南投學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2015），頁 119-137。

33 附帶說明，臺灣古典文學研究也受益於施懿琳、吳福助等人有關《全臺詩》、《全臺文》、《日治時期臺灣小說彙編》之編輯出版。

34 1998 年曾經發生如何評價皇民文學的論爭。

原因；又如周金波，2002 年前衛出版社透過出版《周金波集》，邀請中島利郎撰寫〈周金波新論〉重新評價，認為周金波不是「皇民作家」，而是一位「愛鄉土、愛臺灣的作家」。[35] 不過，如此也恰恰暗示「皇民作家」的存在，終究是臺灣文學研究難以迴避的課題，相關風波、糾葛與影響，乃至精神分析，劉紀蕙〈從「不同」到「同一」——臺灣皇民主體之「心」的改造〉所述，[36] 曾對此詳加討論，值得參考。

當然，除了臺灣本土作家，日人在臺作家，也曾得到不少目光。例如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臺灣》（聯經，2013），旨於觀察真杉靜枝 1930 年代後期到 1950 年代作品與書寫主題，和檢視其人臺灣書寫從戰前到戰後的變化，以及在日本文學、臺灣文學邊緣游移的情形。再如邱雅芳《帝國浮夢：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南方想像》（聯經，2017），評介了 1910 至 1940 年代多位日人的臺灣書寫與南方想像，所論計有竹越與三郎、佐藤春夫、中村地平、真杉靜枝、西川滿等。他如林慧君「日據時期在台日人小說重要主題研究」（淡江中文所博論）、張文薰〈「外地」的意義——濱田隼雄的文學軌跡〉、[37] 許麗芳〈殖民時空下的多重視角：佐多稻子〈臺灣之旅〉（1943-1944）的臺灣書寫〉[38] 等。以上所述對象，儘管在臺角色、身份不一，但都藉著創作而與臺灣社會發生關係，且有趣的是，創作面向或選擇文類往往各有所好，顯示了此一議題研究的豐富性。

又，在審視上述日本文人在臺創作的多樣面貌時，尚可發現這屢屢涉及臺、日跨界狀態；然而不僅於此，高嘉勵《書寫熱帶島嶼：帝國、旅行與想像》（臺中：晨星，2016），更把研究觸角從臺灣這座日人眼中的熱帶島嶼，透過延展和比較研究連結至南洋群島，因而浮顯了一幅更大的網絡關係。換

35 中島利郎，〈周金波新論〉，收入中島利郎、周振英編著，《周金波集》（臺北：前衛出版社，2002），頁 2。

36 劉紀蕙〈從「不同」到「同一」——臺灣皇民主體之「心」的改造〉，收入氏著《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4），頁 233-269。

37 張文薰〈「外地」的意義：濱田隼雄的文學軌跡〉，收入陳芳明編，《臺灣文學的東亞思考：臺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頁 374-397。

38 許麗芳，〈殖民時空下的多重視角：佐多稻子〈臺灣之旅〉（1943-1944）的臺灣書寫〉，《興大人文學報》53 (2014.9): 145-166。

言之，比較研究確實可為日治臺灣新文學研究帶來新想像空間；對此，崔末順《海島與半島：日據臺韓文學比較》（聯經，2013）更是一部難得能夠針對臺、韓殖民地文學進行比較研究的佳作，書中第一輯對於臺韓兩地現代性啓蒙與接受經驗有所爬梳，並對左翼運動和文學論加以比較，且對兩地女性小說的封建性和現代性衝突予以揭露；第二輯則是描述戰爭論述和文學動員概況，其中牽涉東洋論述、女性論述和南方論述，因此能夠同時將文學創作和思想意識納入關照。他如，柳書琴主編《東亞文學場：台灣、朝鮮、滿洲的殖民主義與文化交涉》（聯經，2018），專注 20 世紀前半期東亞文學場域中跨文化流動和殖民主義現象，將「滿洲國」、臺灣、朝鮮、中國淪陷區的文藝生產經驗併觀，透過眾人研究所得的匯集，得使東亞面貌更為複雜深入，甚具價值。

最後，擬再簡介三篇優秀學位論文。其一、張詩勤「臺灣日文新詩的誕生——以《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教育》（1895-1926）為中心」（政大臺文所碩論），此文修正過往文學史以謝春木在 1923 年 5 月，用日文寫下〈詩の真似する〉，於隔年發表《臺灣》雜誌，被當成臺灣新文學史上第一首新詩的說法。她透過報紙資料，指出臺灣第一位在地詩人當是張耀堂，而第一首新詩是 1922 年〈致居住在臺灣的人們〉。其二、陳允元「殖民地前衛——現代主義詩學在戰前臺灣的傳播與再生產」（政大臺文所博論），該文攸關日治時期現代主義詩學的建構，原本一般注目對象是風車詩社，[39] 但作者發現 1930 年代其實存有臺人、在臺日人、灣生以「殖民地臺灣」為中心，輻射而出的 1930 年代東亞殖民地現代主義詩歌活動的圖景；並發現過去罕為人知的日籍女性詩人戶田房子和在花蓮出生、臺日混血的饒正太郎，大大擴充過去學界所知，並提出新的詮釋視野。其三、趙偵宇《觀念、分類與分類源流：日治時期的臺灣現代散文》（秀威，2016；原爲臺大臺文所碩論），重新思考「日治時代」作為臺灣現代散文起源階段的意義，透過對該時代散文作品的蒐羅與相關現象的掌握，包括作家古典散文、在臺日人隨筆、報紙問題

39 關於「風車詩社」，劉紀蕙，〈前衛的推離與淨化：論林亨泰與楊熾昌的前衛詩論及其被遮蓋的際遇〉曾經就此檢討多種文學史和臺灣文學論述，因為重視寫實主義和反殖民、反封建的審美評價，以致於出現排拒抵制前衛文化。收入周英雄、劉紀蕙，《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0），頁 141-144。

散文等，進而與現行散文史的認知結果對話，提出不少發問與提醒，例如：現代散文觀念的指涉意涵、漢文與日文書寫系統的多元生產意義、作品類型與典律的商榷、日本在臺作家定位問題等，為臺灣散文史研究帶來新的思辨空間。

（三）戰後以來研究概況

關於戰後臺灣文學研究，其中最大研究能量主要集中在現當代新文學範疇，其餘面向僅佔少數，以下分別說明之。

1. 古典文學方面

過去學界所論多偏重在日治時期，較值得注意的是，2005 年以後有多篇博士論文致力耕耘戰後階段，他們注意對象主要集中在省內外重要文人個案、文藝社群、報刊場域。如孫吉志「羅尚《戎庵詩存》研究」（中山中文所）、李知灝「戰後臺灣古典詩書寫場域之變遷及其創作研究」（中正中文所）、姚蔓嬪「戰後臺灣古典詩發展考述」（臺師大國文所）、陳盈達〈戰後大陸來台古典詩人張默君及其《瀛嶠元音》〉（東海中文所）、張淵盛「走向國民：跨政權臺灣末代傳統文人的應世之路——以張達修為主的考察」（中正中文所）、梁鈞筌「『中華共同體』的想像與跨國形構——以《中華詩苑》（1955-1967）為觀察對象」（中正中文所）等。

又，若以階段論而言，「戰後初期」情形頗受關注。例如廖振富〈詩與時代創傷：與「二二八事件」相關之臺灣古典詩析論——以詩人作品集為討論範圍〉，[40] 聚焦臺灣古典詩歌如何書寫二二八事件，有助提供二二八文學研究的新材料與新視野；筆者〈戰後初期的臺灣古典詩壇（1945-1949）〉，[41] 透過戰後多種報刊史料，勾勒戰後初期臺灣古典詩壇整體樣貌，此為過去學界未見涉獵的面向；又，林文龍〈省文獻會與漢詩關係初探〉，[42] 專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與古典詩壇關係進行闡述，說明林獻堂、黃純青、林熊祥等人擔

40 廖振富文收入氏著，《臺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頁 259-335。

41 黃美娥，〈戰後初期的臺灣古典詩壇（1945-1949）〉，收入許雪姬主編，《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紀念論文集》（南港：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頁 283-302。

42 林文龍，〈省文獻會與漢詩關係初探〉，《臺灣文獻》59.2 (2008.6): 137-182。

任主委對戰後詩壇重建的貢獻，以及成立詩社、創辦詩刊、舉辦桂冠詩人選拔、編印詩選，促使成為臺灣詩壇重要機構的詳細經過。再如筆者〈戰後臺灣文學典範的建構與挑戰：從魯迅到于右任——兼論新／舊文學地位的消長〉，[43] 由新、舊文學雙重視角出發，說明在魯迅風潮之外，革命元老于右任與臺灣文學亦有密切關係，甚且牽動左／右勢力頡頏、新／舊文學典律競爭，為戰後臺灣文學新秩序的重構帶來刺激與影響。

2. 通俗文學方面

如同前述，日治時期文言與白話通俗小說創作興盛，那麼戰後階段呢？筆者〈戰後初期台灣通俗小說初探——從「作家論」到「場域論」的考察〉，[44] 透過新見史料，發現日治時期已頗活躍的鄭坤五、吳漫沙、林萬生、葉步月等本土作家，於戰後或以新作出版、刊登，或採舊作重刊方式，繼續介入文壇，但受到當時文學場域主流思潮挑戰，整體發展已大不如前。到了 1950 年代，文壇焦點自是反共文學、戰鬥文藝，不過張文菁〈1950 年代臺灣中文通俗言情小說的發展：《中國新聞》、金杏枝與文化圖書公司〉，[45] 將唐賢龍《中國新聞》、中國新聞出版社視為 1950 年代前期通俗出版媒體與業者重要代表；另一方面，又從金杏枝、文化圖書公司談及戰後臺灣通俗出版的專業化，將 1956 年視為戰後臺灣通俗小說市場發展的重要關鍵年度，所論具有讓 1950 年代臺灣通俗小說場域顯影意味，值得重視。

另一方面，有關 1950 年代以後的通俗小說發展，劉秀美《五十年來的臺灣通俗小說》（文津，2001）作了極佳歸納與分析，書中先就通俗小說義界加以說明，而後逐一概述社會言情、武俠、科幻、歷史、推理、鄉野傳奇等各類作品，以及通俗小說和作者、讀者關係，尤其能夠涵蓋 1949-1999 長達五十年間流變面貌，實屬不易。葉洪生、林保淳合撰《臺灣武俠小說發展史》（遠流，2005），以四章十九節的篇幅，將 1951 年至 2000 年半世紀臺灣

43 黃美娥，〈戰後臺灣文學典範的建構與挑戰：從魯迅到于右任——兼論新／舊文學地位的消長〉，《臺灣史研究》22.4 (2015.12): 123-166。

44 黃美娥，〈戰後初期台灣通俗小說初探——從「作家論」到「場域論」的考察〉，《臺灣文學研究學報》26 (2018.4): 185-220。

45 張文菁，〈1950 年代臺灣中文通俗言情小說的發展：《中國新聞》、金杏枝與文化圖書公司〉，《臺灣學研究》17 (2014.10): 89-112。

武俠小說興衰始末娓娓道來，並列舉十位名家作為重點論述對象，除了言及臺灣武俠出版業骨幹的八大書系，亦觸及武俠小說與禁書，報刊連載情形和影視媒體影響，面面俱到展示 1950 年代發軔、60 年代鼎盛、70 年代退潮、80 年代衰微的臺灣武俠小說發展脈絡，極為精彩。透過前面兩部專書，可知類型論是研究重點，陳國偉《類型風景：戰後台灣大眾文學》（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便再次就此探究，專門針對「愛情」、「武俠」、「恐怖」、「科幻」、「推理」五個類型予以深論，而相異之處在於本書採取「大眾文學」名稱，而非「通俗文學」，並使用跨國脈絡視角進行研究，展現新意。

而在通論性質之外，林芳玫《解讀瓊瑤愛情王國》（臺灣商務，2006；時報文化，1994）是九〇年代針對作家個案研究的代表性專著，2020 年則又撰寫〈閱讀瓊瑤：從文化論戰到再製「中國性」〉，[46] 文中先以離散和反離散角度分析瓊瑤，指出她定居臺灣，卻存有離散「中國人」特殊身份，且慣以作品再現「中國性」；次則觀察兩岸評論與閱讀特色，最後再論 1990 年代以後消費流行文化如何成為隱性民族主義而連結兩岸電視劇觀眾等，從中可以發現兩岸仍有不同的接受反應。其次，陳國偉《越境與譯徑：當代臺灣推理小說的身體翻譯與跨國生成》（聯合文學，2013），本書是在臺灣推理小說源頭與脈絡逐漸得到釐清、勾勒之後，重新反省臺灣推理小說的本體，發現因為多次經歷斷裂與重構，以致於無法提供一個連續的史觀，但作者注意到臺灣推理作品裡的身體書寫、翻譯及其形成的文體秩序，其實可讓臺灣的推理小說連結到世界推理小說的傳統，故以身體作為方法加以探索，是另闢蹊徑的嘗試。

3. 新文學方面

關於戰後臺灣新文學研究成果，由於數量龐大，勢必無法進行詳述，以下僅就各階段概況予以簡介，並設法歸納數個研究熱點進行綜述。

以戰後初期臺灣文學研究來看，學界致力方向包括：其一、闡述戰後官方文化體制對臺灣文學場域的影響，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 1945-1947》（麥田，2007）是重要代表品，他以「去日本

46 林芳玫，〈閱讀瓊瑤：從文化論戰到再製「中國性」〉，收入黃美娥主編，《世界中的台灣文學》（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頁 285-321。

化」、「再中國化」框架概括當時官方政策與文化體制運作面貌，說法廣為引用；其二、指出後殖民史觀下臺灣文學「被詛咒」邊緣地位論與作家受挫心理癥狀的刻畫，可以參見陳建忠《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1945-1949）臺灣文學論集》（五南，2007），書中對於戰後初期文藝思潮、作家思想轉折與時代歷史語境的交涉，有生動鮮活的描繪；其三、國共內戰官方派系權力鬥爭與臺灣文學政治的糾葛，徐秀慧《戰後初期（1945-1949）臺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稻鄉，2007）取藉大量戰後初期報刊，對當時官民之間社會重組與文化重編的複雜權力較勁過程的還原，處理出色。其他如新現實主義與魯迅熱潮湧現、重要事件（二二八事件與四六事件）與臺灣文學的關係、報刊文學創作與文藝評論、著名作家個案討論（如楊逵、龍瑛宗、葉石濤在戰後文學活動的考察）等，上述幾本著作或是一般文學史，也多將此視為要點而多所探究，故在此略過不論。除了上述，蔡明諺在大家所注意的小說研究之外，對於戰後初期新詩加以考索，〈戰後初期台灣新詩的重構——以銀鈴會和《潮流》為考察〉，[47] 討論臺灣新詩史上的重要社團「銀鈴會」，及其日文刊物《ふちぐさ》與中日文刊物《潮流》從戰前到戰後的延續、發展過程，同時對於刊物在戰後採取「中日文合刊」而非全採中文書寫方式，特以銀鈴會負責人兼《潮流》主編朱實的觀點為例，對於所謂「跨越語言」之必要性與必然性進行質疑，是可觀之處。

接著進入 1950 年代，反共文學是當時文壇主流，故為研究者需加正視的課題。在兩岸文學史常見的負面評價之外，90 年代齊邦媛在〈千年之淚：反抗懷鄉文學是傷痕文學的序曲〉，把反共懷鄉文學視為一個民族在大時代下的苦難集體記憶，並與大陸傷痕文學進行連結，呼籲該對這些當年曾引起廣大共鳴的作品，再做冷靜評估。[48] 其後，王德威將反共文學與解嚴後的政治小說予以聯繫，在〈一種逝去的文學？——反共小說新論〉中，承繼前述反共文學與傷痕文學、政治小說的辯證關係，並以「逝去的文學？」懸疑性

47 蔡明諺，〈戰後初期台灣新詩的重構——以銀鈴會和《潮流》為考察〉，《臺灣文學研究學報》20 (2015.4): 41-71。

48 齊文收錄氏著，《千年之淚：當代臺灣小說論集》（臺北：爾雅出版社，1990），頁 29-48。

標題，暗寓其中逝而未逝的懸宕性。[49] 梅家玲則關心陳紀瀅小說、文獎會得獎小說的家國想像與性別書寫，對於反共小說寫作手法進行深刻品評。[50] 至於長期致力開拓五〇年代研究的應鳳凰，她在〈五〇年代臺灣小說「反共美學」初探〉，關注反共文學創作技藝，希望能夠通盤蠡測「反共美學」的典律。[51] 另外，陳康芬「政治意識型態、文學歷史與文學敘事——台灣五〇年代反共文學研究」（東華中國語文系博論），不將反共文學簡化為國家暴力結果，而將之理解為「文學價值觀如何為政黨政治意識型態所主導，並制約於文學歷史的客觀現實發展環境的歷史特徵」，去說明反共文學在戰後臺灣作為一段特殊文學歷史的面貌。以上學者，均為重探反共文學而努力。

不過，在反共文學之外，尚有許多新開發議題。例如范銘如《眾裡尋她：臺灣女性小說縱論》（麥田，2002），注意來臺省外女性如何化身成為本土女性文學學習白話文書寫的橋樑，且還發現這些女性書寫對臺灣在地空間的重視，與 1950 年代男性懷鄉文學展開對話，提醒作家性別差異態度。再如，王鈺婷「抒情之承繼，傳統之演繹：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美學風格及其策略運用」（成大臺文所博論），針對五〇年代女性文學最大宗的抒情散文現象進行討論，以「抒情傳統」作為觀察視角，重勘五〇年代文學史與女性散文史，指出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具備多元與嶄新的面向，以及美文體系複雜的文學意涵與美學傳統，勾勒具體。他如侯如綺《雙鄉之間：臺灣外省小說家的離散與敘事（1950-1987）》（聯經，2014），關注來臺外省作家的離散生命敘事，在雙鄉之間歷經的適應挑戰、生存掙扎，以及個人身份認同、家庭倫理協商等，是少數、較早全面探索外省作家之作。另，封德屏「國民黨文藝政策及其實踐（1928-1981）」（淡江中文所博論），雖非以 1950 年代為起點，但因概述 1928-1981 年間國民黨文藝政策的制訂、相關文藝體制的

49 王德威，〈五十年代反共小說新論——一種逝去的文學？〉，收入張寶琴、邵玉銘、瘂弦主編，《四十年來中國文學》（臺北：聯合文學，1997），頁 67-84。

50 梅家玲，〈五〇年代國家論述／文藝創作中的「家國想像」——以陳紀瀅反共小說為例的探討〉、〈五〇年代台灣小說中的性別與家國——以《文藝創作》與文獎會得獎小說為例〉，收入氏著，《性別，還是家國？五〇與八、九〇年代臺灣小說論》（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4），頁 63-126。

51 應鳳凰，〈五〇年代臺灣小說「反共美學」初探〉，收入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主編，《臺灣文學史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高雄：春暉出版社，2008），頁 437-469。

建置、文藝政策的推動與對臺灣文學的影響情形，故頗多篇幅集中於 50 年代情形，所得可供參考。

有關六〇年代研究，自以現代主義文學論述為要。柯慶明〈六十年代現代文學？〉以現代詩、小說、散文為例，全面鳥瞰現代主義理論與書寫實踐，並特別強調所謂現代技藝與中國文學傳統的複雜辯證現象，甚至在論文題目上標示了問號，以為還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52] 以此提醒應該注意現代主義文學「縱的繼承」和善於轉化的面向。黃錦樹〈中文現代主義——一個未了的計畫？〉[53] 則是一方面從歷史、結構及效應的角度，描述現代中文在臺灣特殊的現代主義經歷，另一方面發現箇中存有專業化取向和高質量的自律美學實踐，認為可將之視為當代臺灣中文文學的生產，製造了可能性的條件；而在實際分析時，他還將「中文現代主義」，分成中國性—現代主義—純正中文、翻譯—現代主義—破中文，進一步討論語言策略和美學經濟的問題，展現了新穎而具開拓性的發問。此外，陳建忠與王梅香選擇從美援文化體制和冷戰氛圍，重探臺灣現代主義文學，前者如《島嶼風聲：冷戰氛圍下的臺灣文學及其外》（新北：南十字星文化工作室，2018），後者如博士論文「隱蔽權力：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文學（1950-1962）」（清大社會所），二人均將美新處及其出版事業或翻譯行動作了更為全面的分析，且擴及香港文學的考察，引入比較研究，所得可喜，且有利開啓新研究版圖。

至於張誦聖，是長期鑽研此一問題的重要學者，她曾出版專書與撰寫多篇論文，觀點廣為學界引用，茲以〈現代主義與台灣現代派小說〉為例加以說明。該文引用李歐梵看法，認為「台灣現代派文學運動是一個較為純粹的文化菁英份子的前衛藝術運動」，且強烈反映出西方現代主義的特色「菁英式的美學觀念」，以此樹立臺灣現代主義的定位；其次，還提及現代主義文學在臺灣的興起，不是針砭戰鬥文藝、懷鄉文學題材的侷限性而已，也是對當時文學「質」的不滿；其三，認為應該留意現代主義對臺灣小說研究方法學所帶來的影響，亦即顏元叔大力推介的新批評主義，並又言及尚須注意臺

52 柯慶明，〈六十年代現代文學？〉，收入氏著，《中國文學的美感》（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5），頁 452。

53 黃錦樹，〈中文現代主義——一個未了的計畫？〉，收入氏著，《謊言或真理的技藝：當代中文小說論集》（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3），頁 21-57。

灣小說與西方現代主義之間「二度接受」問題、「時程壓縮」現象；其四，修正一般以為六〇年代是臺灣現代主義極盛期的說法，強調就文學史角度來看，成熟的現代派作品是在現代主義風潮消匿之後才出現。[54] 而繼前作之後，後來又試圖將臺灣與東亞現代主義文學合論，〈試談幾個研究「東亞現代主義文學」的新框架——以臺灣為例〉一文，[55] 是在掌握東西方晚近有關現代、現代性、現代化與文學之間的多種研究論述後，企圖再提出數種有關現代主義文學研究的新框架。以上，可以深刻體會作者長期耕耘此一領域的精彩和突破。

到了七〇年代研究，焦點所在自屬鄉土文學與鄉土文學論戰。實際上，「鄉土」是臺灣文學的靈魂關鍵詞，有關鄉土的討論與書寫想像，跨越了戰前與戰後，且到了九〇年代，在文學刊物或全國性地方文學獎，以鄉土為題材的作品更日益增多，范銘如於是進一步提出了「後鄉土」的概念。她強調「後鄉土文學不是復古、懷舊式的回歸人文傳統，亦非僅僅是時下臺灣本土意識或民粹運動的文學再現，而是綜合臺灣內部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結構性調整、外受全球化思潮滲透衝擊的台灣鄉土再想像產物」，[56] 其所謂「後鄉土」之說獲得不少迴響。又，同樣有感於「鄉土」文學書寫，在不同時空背景下，已形構或被賦予新的鄉土意涵的陳惠齡，則以「新鄉土」框架予以觀察，[57] 嘗試廓清鄉土文學的「文體意義有了變革後」，驅使出「新鄉土」的想像與論述的現象。[58] 在最新著作《演繹鄉土——鄉土文學的類型與美學》

54 張誦聖，〈現代主義與台灣現代派小說〉，收入氏著，《文學場域的變遷：當代台灣小說論》（臺北：聯合文學，2001），頁 7-36。又，有關於臺灣小說與西方現代主義之間「二度接受」問題、「時程壓縮」現象，邱貴芬〈「在地性」的生成：從台灣現代派小說談「根」與「路徑」的辯證〉有所重思，且進一步關注文化翻譯過程中，有關臺灣現代主義「在地性」的產生，文見《中外文學》34.10 (2006.3): 125-154。

55 張誦聖，〈試談幾個研究「東亞現代主義文學」的新框架——以臺灣為例〉，《臺灣文學研究集刊》5 (2009.2): 41-57。

56 范銘如，〈後鄉土小說初探〉，《臺灣文學學報》11 (2007.12): 24。案，之前也曾使用「輕鄉土」一稱。

57 陳惠齡，《鄉土性．本土化．在地感：台灣新鄉土小說書寫風貌》（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0）。

58 陳惠齡，〈空間圖式化的隱喻性——台灣「新鄉土」小說中的地域書寫美學〉，《臺灣文學研究學報》9 (2009.10): 130。

（萬卷樓，2020），她將「鄉土」和「鄉土書寫」問題化和脈絡化，特別留意 70 年代到 90 年代以降相關情況，發現其中涵蓋甚廣，如思想內涵、創作文體、文本符號、書寫類別、美學表現、世代與時代、文類與心靈、族群文化與全球化等，展演了琳瑯滿目的「鄉土學」。而在鄉土到後鄉土／新鄉土的脈絡及相關研究成果之外，黃錦樹〈內在的風景：從現代主義到內向世代〉，[59] 所進行的是關於中文現代主義世代的觀察，留心解嚴以後現代主義到內向世代的延續與轉折，若能與上述後鄉土寫作參看，將會發現兩道創作殊異風景，但又有交錯之處，如袁哲生、童偉格等，值得更多反思。

另外，八〇年代解嚴前後的臺灣文學與性別研究，亦是另一熱點。隨著性別意識抬頭，李昂〈殺夫〉、廖輝英〈不歸路〉等帶有強烈女性／主義本位的小說，是此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故作家和作品論述累積不少；到了九〇年代以後，女性主義運動更趨多元，愈發刺激女性意識小說的發展。[60] 面對上述情景，邱貴芬《後殖民及其外》（麥田，2003）、《仲介臺灣．女人：後殖民女性觀點的臺灣閱讀》（元尊文化，1997）選從後殖民觀點切入女性文學；劉乃慈《布迪厄與臺灣當代女性小說》（臺灣學生書局，2016），亦以女性為重返臺灣文學場域的媒介；而梅家玲則鎖定「性別論述」，由此重談臺灣小說的生產問題。[61] 至於李癸雲、[62] 洪淑苓，[63] 則是留意女性詩人的主體形構、自我書寫與意象經營。綜上可知女性視角和女性主義思潮，對於臺灣文學發展與研究取徑的影響。

且，不僅於此．如同劉亮雅所述，同志運動首先寄身於女性運動，但後來同志運動／文學「追求主體性的訴求」路線，與解嚴前後「反對運動追

59 黃錦樹，〈內在的風景：從現代主義到內向世代〉，收入氏著《論嘗試文》（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16），頁 325-343。

60 劉亮雅，〈解嚴以來的臺灣小說：回顧與展望〉，《思想》1 (2008.1): 123-130。

61 梅家玲編，《性別論述與臺灣小說》（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0）。

62 李癸雲，《朦朧、清明與流動：論臺灣現代女性詩作中的女性主體》（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2）、《結構與符號之間：臺灣現代女性詩作之意象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8）。

63 洪淑苓，《思想的裙角——臺灣現代女詩人的自我銘刻與時空書寫》（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又，作者尚有《臺灣民間文學女性視角論》(臺北：博揚文化，2013)，是從女性視角著眼的民間文學研究專著。

求台灣主體性的訴求」一致，[64] 因此挑戰傳統價值觀與體制的同志、酷兒文學，亦獲得較多關注與資源，最終更脫離女性運動自成一家。有關同志、酷兒文學研究，「發明了『酷兒』一詞作為英文 queer 一字之中譯」的紀大偉，[65] 與持續將酷兒理論引介、吸納進臺灣文學研究的劉亮雅，[66] 均是使酷兒文學研究勃興的重要推手。又，同樣留意性別議題，謝世宗《階級攸關：國族論述、性別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文學再現》（群學，2019），則是將國族、性別和資本主義綰合考察，兼顧後殖民／女性主義與馬克斯主義批評視野，重新詮釋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王拓、楊青矗等人作品，使階級討論和左翼文學批評，與新一波全球化經濟挑戰進行聯繫。

另，1987 年解嚴以後，則是臺灣歷史記憶重建的時刻，彭小妍《歷史很多漏洞——從張我軍到李昂》（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2002）深刻討論臺灣文學中重建歷史的議題，觀察對象包括吳濁流、張我軍、陳映真、李昂等。而此一時期，如同劉亮雅所述，亦可見「後現代與後殖民的並置、角力和混雜，是解嚴之後主導的文化思想、文學主題和美學手法」，[67] 相關研究可由劉亮雅《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臺灣小說專論 》（麥田，2006）、《遲來的後殖民：再論解嚴以來臺灣小說》（臺大出版中心，2014）一窺端倪。到了 2000 年之後，更有許多不同族群的臺灣小說家重返日治記憶，於是劉亮雅再度出版《後殖民與日治記憶：二十一世紀臺灣小說》（臺大出版中心，2020），可見系統性考掘解嚴以來臺灣小說的進程，且在作者用心爬梳中，清楚彰顯了解嚴以後臺灣當代小說的創作變化。

實際上，在戰後臺灣新文學中，小說研究風氣最為蓬勃，分析向度堪稱琳瑯滿目，例如范銘如《文學地理：臺灣小說的空間閱讀》（麥田，2008）、蘇偉貞〈（新）女性的出走與回歸——以八、九〇年代《聯合報》小說獎為主兼論媒體效應〉、[68] 陳國偉《想像臺灣：當代小說中的族群書寫》（五

64 劉亮雅，〈解嚴以來的臺灣小說：回顧與展望〉，《思想》1(2008.1): 127。

65 劉亮雅，〈台灣理論與知識生產：以一九九〇年代台灣後殖民與酷兒論述為分析對象〉，《臺灣文學研究集刊》18 (2015.8): 64；紀大偉，〈酷兒論：思考臺灣當代酷兒與酷兒文學〉，《酷兒啟示錄：當代臺灣 QUEER 論述讀本》(臺北：元尊文化，1997)，頁 9-16。

66 劉亮雅，《情色世紀末：小說、性別、文化、美學》(臺北：九歌出版社，2001)。

67 劉亮雅，〈解嚴以來的台灣小說：回顧與展望〉，頁 124。

68 蘇偉貞，〈（新）女性的出走與回歸——以八、九〇年代《聯合報》小說獎為主兼論媒體

南，2007）、張俐璇《建構與流變：「寫實主義」與臺灣小說生產》（秀威，2016）、黃啓峰《戰爭・存在・世代精神：臺灣現代主義小說的境遇書寫研究》（秀威，2016）、楊雅儒《人之初・國之史：二十一世紀臺灣小說之宗教修辭與終極關懷》（翰蘆，2016）、高鈺昌「『聽—見』城市：戰後台灣小說中的台北聲音景觀」（成大臺文所博論）、金儒農「當代科技環境下台灣小說的新美學建構」（中興中文所博論）等。或從地理空間、小說獎項、族群書寫、文藝觀念、小說流派、宗教修辭入手，或從聲音和都市、科技與美學著眼，大抵採用某些特殊觀看視角、主題分析、西方理論，去討論小說書寫、生產或相關場域問題等，以上嘗試都極具意義。

小說之外，關於散文研究，學界長期倚重鄭明俐《現代散文構成論》（大安，1988）《現代散文縱橫論》、《現代散文類型論》、《現代散文現象論》（三者均為學生書局，2018）等著作，之後張瑞芬投入史料挖掘與彙整，並試圖引入性別視角，完成了《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論篇》（麥田，2006）、《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麥田，2007），可供參考；又，何寄澎《永遠的搜索——臺灣散文跨世紀觀省錄》（聯經，2014），對於林文月、楊牧、張秀亞、王鼎鈞等人散文書寫，有深刻評述。再如鍾怡雯《雄辯風景：當代散文論Ⅰ》、《后土繪測：當代散文論II》（皆聯經，2016），書籍雖然並非全以臺灣散文為研究對象，但論及梁實秋、林語堂、余光中、楊牧、三毛、簡媜創作，旅行文類、美食散文探討，甚至撰寫了〈台灣現代散文史縱論〉，[69] 對臺灣當代散文創作浪潮和美學議題表現、散文歷史建構，已自成一家之言，別有見地。

現代詩方面，楊宗翰曾經概括區分新詩評論在臺灣，從 1930 年代起，陸續經歷印象式批評、新批評、比較文學批評，到 80 年代之後，真正出現批評手法的分野和新變，此後或關注女性詩作、傳統與當代的匯通、後現代詩學、主體性批評等。[70] 而在前述詩學評論建立過程中，被視為「比較文學的大師級人物」葉維廉，迄今受到高度肯定，翁文嫻以「葉維廉詩學對台

效應〉，《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0 (2010.4): 149-181。

69 鍾怡雯，〈台灣現代散文史縱論〉，《華文文學》117 (2013.8): 91-100。

70 楊宗翰，〈構築詩的美學史——評簡政珍《臺灣現代詩美學》〉，《笠》250 (2005.12): 99-101。

灣詩壇的貢獻研究」為科技部計畫議題展開研究，她注意到葉氏有關「『瞬間』美學的再延伸、翻譯的要領、東西方語言轉換的前衛性探討、『瞬間』或『線性連結』的句法傳承狀態……，這些都是台灣詩學討論中，鮮有人觸及的議題」。[71] 又，簡政珍之詩學建構，亦別具一格，陳俊榮注意到其人「詩學理論主要源自現象學家胡塞爾、海德格、布萊與以哲等人，他反對以理論來讀詩，主張以『有感的閱讀』來詮釋作品。……提出其空隙美學的理論，主張讀者在有形的文字之外要看到空白處的弦外之音」，故在臺灣樹立了獨特詩論家地位。[72] 至於青壯輩學者，前已提及洪淑芩、李癸雲積極從事女性詩人研究；另如劉正忠多從個案研究入手，針對若干名家詩學論述和創作樣貌進行剖析，包括楊牧、余光中、鄭愁予等，常有慧思；楊小濱從事兩岸詩歌比較，阮美慧長期投注心力於笠詩社，解昆樺與楊宗翰有多本針對詩社、詩刊、詩學或詩史研究之專書等，亦值得肯定。大抵，透過以上學者研究所得，有助掌握目前臺灣新詩研究主要趨向。

而除了以上不同文類研究成果之外，次文類或某種文學現象，也往往成為注意焦點，如林淇瀁《書寫與拼圖：臺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麥田，2001）、《場域與景觀：台灣文學傳播現象再探》（印刻，2014），和須文蔚《臺灣文學傳播論 ── 以作家、評論者與文學社群為核心》（二魚文化，2009），留心臺灣文學傳播現象和社會變遷互動關係，以及作家、評論者和文學社群的角色，提供臺灣文學研究一個嶄新的視角，是不能忽略的論著。再如自然寫作研究，從吳明益《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 1980-2002：以書寫解放自然》BOOK 1、BOOK 2（新北：夏日出版，2012），到李育霖《擬造新地球：當代臺灣自然書寫》（臺大出版中心，2015）出版，可以一窺臺灣自然書寫探討與西方晚近興起的「生態批評」的連結軌跡，以及相關書寫審美批評的新嘗試。其他如眷村文學、飲食書寫、海洋文學研究等，亦是學界關切的研究議題；此外，晚近還有臺、港文學關係或比較研究，或是對於馬華在臺作家、冷戰時期臺灣與東南亞華文文學諸議題的拓展，李瑞騰、蘇偉貞、須文蔚等人成果值得肯定，同時顯示臺灣文學研究版圖日趨開闊。

71 翁文嫻，〈「出神」與「凝注」：詩人的心怎麼會去得這樣遠 ── 葉維廉詩學專訪〉，《臺灣文學研究》8 (2015.6): 193-219。

72 陳俊榮，〈簡政珍的現象學詩學〉，《臺灣文學學報》30 (2017.6): 1-25。

當然，整個戰後臺灣新文學研究，不能漠視者，尚有作家個案研究。例如林芳玫《永遠在他方：施叔青的「臺灣三部曲」》（開學文化，2007）、鄭穎《鬱的容顏：李渝小說研究》（印刻，2008）、廖淑芳「國家想像、現代主義文學與文學現代性——以七等生文學現象為核心」、簡義明「書寫郭松棻：一個沒有位置和定義的寫作者」（皆清大中文所博論）等。而頗具異趣的是，即是針對同一作家，因研究者取徑有別而更見幽微奧妙，如李奭學《三看白先勇》（允晨，2008）留心白氏作品與中西小說關係，江寶釵《白先勇與台灣當代文學史的構成》（駱駝，2004）從情節、主題、影響、文學傳播、文學歷史等角度論述白先勇，曾秀萍《孤臣．孽子．臺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說論》（爾雅，2003），從白氏同志書寫著眼，總論白先勇在「孤臣」、「孤兒」與「孽子」三大文學創作上的開展與地位，以上可使作家文學生命更為完整顯豁。[73] 又，或者也會出現同一作家不同形象的塑造與對話，如參看趙剛《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聯經，2011）和陳明成《陳映真現象：關於陳映真的家族書寫及其國族認同》（前衛，2013），可見學術探索與意識形態的糾葛。另，值得一提的是，真理大學每隔兩年為「牛津文學獎」得主召開研討會，會後都有研討會論文集出版，如鄭清文、李喬、楊青矗、吳晟、宋澤萊等，已成為研究本土重要作家不能忽略的論域。

三、文學史著述紛出與史觀分歧對話

接續前面有關臺灣文學斷代研究重點介紹之後，以下擬就文學史著述現象進行剖析，這是因為臺灣文學學科建立二十餘年來，無論是專書或論文，相關書寫研究已經積累不少，不僅撰述類型日趨多元，箇中也蘊藏了史觀分歧的情形。

---

73 關於白先勇最新研究，可參白睿文、蔡建鑫主編，《重返現代：白先勇、《現代文學》與現代主義》（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16），該書彙集 2008 年 5 月於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舉辦之「重返現在：白先勇、《現代文學》與現代主義國際研討會」之會議座談、作家訪談及論文，由著名小說家「白先勇論」出發，再進而關注《現代文學》雜誌和「現代主義」，從臺灣到海外，高度展示了「重返」研究的複雜時間性和遼闊空間性研究價值，以及北美研究視野。

以葉石濤 1987 年出版的《臺灣文學史綱》而言，在發行未久，即曾招致呂正惠以為過分簡化臺灣文學駁雜的歷史發展，或刻意忽略本土論內部實有不同立場與主張的批判。[74] 事實上，學界對本土看法的紛擾，反映的不單是臺灣歷經多個政權殖民與戰後國民黨接收臺灣的複雜歷史背景，同時也揭示被斷裂 [75] 與被嫁接 [76] 的文學歷史，究竟要如何在共存環境中共生、共構的文學史難題。而到底該如何協商、整合臺灣文學駁雜的歷史性時，所面臨的各種衝突、角力問題，也讓書寫、重寫與再寫臺灣文學史的倡議時有所聞。

彭瑞金 1991 年出版的《臺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自立晚報；春暉，1997 再版），雖僅以戰後 40 年（1945-1985）的文學活動與發展爲主軸，但藉新出土的史料擴充、修正《臺灣文學史綱》舊有的論述，故較前者更明確化傳達，要將「本土」推向「重新喚回整體臺灣人、臺灣文化的臺灣主體意識」的主張，可視爲葉氏史觀的承繼者。隔年，邱貴芬發表〈「發現臺灣」：建構臺灣後殖民論述〉，正式將後殖民論述引進臺灣，並指出「臺灣過去幾百年的歷史、文化、演進，主要基於外來殖民者與本土被殖民者之間文化和語言衝突、交流的互動模式」，[77] 以及「臺灣文學流變過程中，文學典律的形成與重建和臺灣的被殖民經驗有密切關係」，[78] 乃取藉西方理論資源來厚實臺灣本土論。只是，邱氏想以後殖民理論確立臺灣主體論的新史觀，固然為臺灣文學史的論述帶來理論資源；但另一方面，後殖民論述抵中心／中國的批判路線，也讓學界對於究竟要如何闡釋、評價與書寫臺灣文學史的焦慮，乃至爭辯逐漸白熱化。

值得注意的是，當邱貴芬等出身外文系的學者，積極透過援引西方後殖民論述來建構臺灣文學的主體性時，施懿琳、江寶釵、楊翠、黃美娥等人，則是在 1990 年代初期深入臺灣各地，積極從事田野調查、口述歷史與蒐羅文學史料等工作，用文學史料去堆疊出臺灣文學的輪廓，也為文學主體性的

74 呂正惠，〈評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1 (1988.2): 221-232。

75 陳建忠，《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1945-1949）臺灣文學論集》（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7）。

76 黃美娥，〈聲音・文體・國體——戰後初期國語運動與臺灣文學（1945-1949）〉，《東亞觀念史集刊》3 (2012.12): 223-270。

77 邱貴芬，〈「發現臺灣」——建構臺灣後殖民論述〉，《中外文學》21.2 (1992.7): 151。

78 同上註，頁 151。

建立扎下根柢，結果促成區域文學研究的勃興。自 1995 年第一本區域文學史《臺中縣文學發展史》出版，到《彰化縣文學發展史》（1997）、《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1998）、〈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1999）等北中南區域文學史的陸續完成以來，[79] 區域文學已發揮從點到線，再由多條文學發展伏線，重新架設起臺灣文學整體結構的功能，甚至於改寫過去單以新文學勾勒臺灣文學史的認知框架。尤其，出身鄒族的 Pasuya Poiconx（浦忠成），幾乎也是在此同一時間，從故鄉鄒族出發漸及全國各地原住民族，積極從事民族文學調查研究，並在前後歷時二十年的田野調查與寫作中，交出臺灣文學史上第一部原住民族文學史《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2009）。關於此書內容、書寫策略與出版意義，已於前述。

此外，90 年代還可關注的是，1995 年《中外文學》「臺灣文學的動向」專題和餘波。在刊出陳昭瑛〈論臺灣的本土化運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80] 陳芳明〈百年來的臺灣文學與臺灣風格——臺灣新文學運動史導論〉後，[81] 二人觀點的差異，把當時學界對後殖民的討論，延長到對後現代史觀的思考。這場在文學史上被稱為「後現代與後殖民論爭」的事件，後來還加進來廖朝陽、廖咸浩的對話，[82] 論爭備受學界關注；但，論者多留心後殖民、後現代理論在論戰中的位置，及其在統獨論述中所發揮的效益，卻鮮少注意到各家論者對本土、臺灣意識、中國意識、後殖民、後現代等修辭，從其作為概念到成為一種史觀的闡釋、詰問，除了有助於重新挖掘臺灣文學

79 上述諸書皆由該地縣、市立文化中心出版。其後，各地區包括離島等地之區域文學發展史也陸續出版：莫渝、王幼華，《苗栗縣文學史》（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葉連鵬，《澎湖文學發展之研究》（澎湖縣：澎湖縣文化局，2001）；龔顯宗，《臺南縣文學史》（臺南：臺南縣政府，2006）；李瑞騰、林淑貞、顧敏耀，羅秀美、陳政彥，《南投縣文學發展史》（南投：南投縣文化局，2009）等。另，迄今仍然可見區域文學會議召開，如 2011 年至 2020 年間，林秀蓉，余昭玟已經舉辦七屆屏東文學會議。

80 陳昭瑛，〈論臺灣的本土化運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中外文學》23.9 (1995.2): 6-43。

81 陳芳明，〈百年來的臺灣文學與臺灣風格——臺灣新文學運動史導論〉，《中外文學》23.9 (1995.2): 44-55。

82 廖朝陽，〈中國人的悲情：回應陳昭瑛並論文化建構與民族認同〉，《中外文學》23.10 (1995.3): 102-126；〈再談空白主體〉，《中外文學》23.12 (1995.5): 105-109。廖咸浩，〈超越國族——為什麼要談認同？〉，《中外文學》24.4 (1995.9): 61-76；〈狐狸與白狼：空白與血緣的迷思〉，《中外文學》25.5 (1996.10): 154-157。

史的縱深與新意，也引來後續更多論者思索「後現代」、「後殖民」和臺灣社會的真正關係。例如廖炳惠〈台灣：後現代或後殖民？〉、[83] 劉亮雅《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專論》（麥田，2006）；又或者加入思考何謂臺灣文學史，或如何書寫臺灣文學史的討論，其中，1998 年張誦聖、陳芳明、廖炳惠與瓦歷斯．諾幹等人，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召開探討「現當代臺灣文學的成就與變遷」的學術研討會，針對在臺灣特殊的文學體制下，[84] 臺灣文學本質與發展，究竟是後殖民還是後現代情境的討論，[85] 又或不同民族／種族的歷史觀如何改寫臺灣文學史的論辯，[86] 即是這波論爭最重要的回應之一。

甚至不難發現，陳芳明〈百年來的臺灣文學與臺灣風格——臺灣新文學運動史導論〉一文，實際上已是選擇從後殖民理論來重構文學史的重要實踐，此文正為往後十餘年來從事《台灣新文學史》寫作工程奠定重要的論述基礎。不過，陳氏揭開重寫臺灣新文學史的序幕，並以「再殖民」定調戰後至解嚴以前國民黨政府對臺灣／文學箝制的立論，也引來陳映真質疑與批評，[87] 此即為期一年多的「雙陳論戰」。儘管陳芳明與陳映真的意見分歧，未能在論戰中有效對話或達成共識，但兩造因史觀的悖反所產生的激辯，其實也為日後有心撰述臺灣文學史的論者，提供可能開展的途徑與豐富的思想資源。不論是孟樊以「新歷史主義」重新追問臺灣文學史還能如何翻新重寫的《文學史如何可能：臺灣新文學史論》（揚智文化，2006），或由出身馬來西亞的研究者張錦忠、黃錦樹嘗試藉由在臺馬華文學特殊的生產現象，思索（在臺）馬華文學是否歸屬臺灣文學複系統的史觀，或企圖藉此「複寫」臺

83 廖炳惠，〈台灣：後現代或後殖民？〉，收入氏著，《另類現代情》（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01），頁 44-59。

84 張誦聖，〈文學體制與現、當代中國／臺灣文學：一個方法學的初步審思〉，收入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臺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0）。

85 如陳芳明，〈後現代或後殖民：戰後臺灣文學史的一個解讀〉、廖炳惠〈臺灣後現代或後殖民〉。前揭文收入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臺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

86 瓦歷斯．諾幹，〈關於臺灣原住民族當代文學的幾點思考〉，收入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臺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

87 陳映真，〈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批評陳芳明先生的「臺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學》189 (2000.7): 138-160。

灣文學，[88] 在在可以視為攸關臺灣文學為何、臺灣文學史該如何書寫的論爭回應。此外，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於 2007 年召開「臺灣文學史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也是其中一環；與會者不單延續針對史觀、斷代分期與文學類型進行討論，同時還將觸角延伸到體制化、學科化對臺灣文學史書寫的影響問題。[89]

且，不僅止於此，在多數學者用心引進新的文學／文化理論、建構新的主體認同，以重構新臺灣文學史時，古典文學和通俗文學領域，也開始獲致學者的青睞。如，廖雪蘭早在 1980 年代即著手撰寫明鄭至日治時期以來的古典詩史，到了 1999 年正式出版《臺灣詩史》（文史哲）；其後，黃美娥〈臺灣古典文學史概說（1651-1945）〉一文，嘗試兼顧古典詩歌、散文與小說三種文類，並提出重新看待「新」與「舊」、「現代」與「傳統」辯證關係的說法。[90] 另，尚有劉秀美對於「通俗」文學進行考掘，於 2001 年出版《五十年來的臺灣通俗小說》（文津），填補了歷來臺灣文學史將「通俗」排拒在「現代文學」之外的缺憾；2005 年，更有葉洪生、林保淳合撰《臺灣武俠小說發展史》（遠流），使戰後臺灣通俗文學面目益趨完整，此二著作已於前述。

至於陳芳明終於在 2011 年交出的《台灣新文學史》（聯經），確實在研究觀點與方法上有所突破，例如對於現代主義文學的重新評價，以及將女性、同志、原住民與馬華文學等，過去被排拒在男性的、異性戀的、漢人的、臺灣的文學史之外的作家與文學文本納入《台灣新文學史》。[91] 當然，沒有任何一部文學史，能滿足各家學派，或因應各種時代需求；因此，反過來說，《台灣新文學》撰寫期間或完成後 [92] 的洞見與不見，恰好推進、帶動

88 張錦忠，〈（八〇年代以來）台灣文學複系統中的馬華文學〉，《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3），頁 135-150；張錦忠、黃錦樹編，《重寫臺灣文學史》（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7 年）。

89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主編，《臺灣文學史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春暉出版社，2008）。

90 黃美娥，〈序論〉，收入氏著《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頁 III。

91 紀大偉，〈書評《臺灣新文學史》〉，《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0 (2012.3): 211-219。

92 陳芳明在《台灣新文學史》的〈序言〉中自承，臺灣新文學史的寫作前後「苦惱十年以上」。具體而言，自其 1995 年在《中外文學》發表〈百年來的臺灣文學與臺灣風格——臺灣新文學運動史導論〉為重寫台灣文學史揭開序幕，爾後又陸續在《聯合文學》連載部

後續更多文學史論述和論著的開展與書寫。例如，張瑞芬認為《台灣新文學史》的整體架構仍無法對女性作家的文學成就給予積極評價，且有重小說、詩歌而輕散文的侷限，因此花了數年心力梳理與撰寫《五十年來臺灣女性散文．評論篇》（麥田，2006）。再者，指出屈居性別弱勢的女性與同志，以為在《台灣新文學史》中不無可能陷入被收編危機的紀大偉，在 2017 年即以《同志文學史：臺灣的發明》（聯經）一書，特寫同志、歷史與文學之間複雜的政治關係。再如新詩史方面，因常見意識形態左右論者對詩人、詩歌藝術價值評斷而感到疑慮的鄭慧如，於是選擇以詩藝作為討論詩歌判準，新近出版《臺灣現代詩史》（聯經，2019）便是個人審美觀點的實踐。又，在散文與詩歌分類研究史之外，邱貴芬、陳建忠、應鳳凰、張誦聖、劉亮雅合著的《臺灣小說史論》（麥田，2007），因為注意到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出版時間較早，90 年代以後臺灣文學結合後殖民理論和弱勢族裔論述所開發出來的複雜議題不及納入，以及解嚴以後小說尚未探討等因素，因此有了本書的策劃，[93] 最後集結多人之力，刻畫了日治到解嚴之後小說流變樣貌；此外，邱貴芬稍早之前也嘗試以「後殖民之外」的女性小說史學方法論，進行小說史和文學史的性別探問。[94]

而到了晚近，其實文學史的書寫風氣仍然未歇，宋澤萊《臺灣文學三百年》[95] 不同於常見的後殖民視角，改由弗萊神話原型批評入手，進而觀察臺灣文學的類似性和演變規律。於是，有別於一般臺灣文學史常見「十年」一期、竹節式撰寫方式，書中將郁永河之後的三百年臺灣文學發展，劃分為傳奇浪漫文學時代、田園文學時代、悲劇文學時代、諷刺文學時代、新傳奇浪漫文學時代，並以循環史觀方式論證如何從「傳奇文學」再回到「新傳奇文學」。上述體會臺灣文學發展史的方式，是一種精神分析式的感知分析，因此如同作者所言，可以少去原先臺灣文學史著述最為人詬病的意識形態問

分內容，直到 2011 年正式成書出版來看，《台灣新文學史》前後至少歷經 17 年的撰寫歷程。參見陳芳明，〈序言：新台灣．新文學．新歷史〉，收入氏著《臺灣新文學史》，頁 5。

93 邱貴芬，〈序〉，《臺灣小說史論》，頁 3-4。

94 邱貴芬，《後殖民及其外》（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3）。

95 宋澤萊，《台灣文學三百年》（新北：印刻出版社，2011），後來又繼續出版《台灣文學三百年（續集）：文學四季變遷理論的再深化》（臺北：印刻出版社，2018）。

題，至此文學史也非直線發展模式，而是成為一種循環再生的狀態。以上嘗試，有助於發現臺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類似性。

最後還需一提的是，國立臺灣文學館的「臺灣文學史長編」大型編撰計畫（2010-2013）及其成果，此為當時擔任館長的李瑞騰所策劃，最終完成從原住民口傳文學到母語文學 33 冊書籍出版。儘管撰寫體裁其實並不一致，但仍多少填補、重寫了過往文學史著作未及處理或尚待開發的議題與面向。其中，除了增添多種古典文學著作外，陳大為《最年輕的麒麟：馬華文學在臺灣（1963-2012）》（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或可回應黃錦樹認為《臺灣新文學史》中仍未獲得對等關注的不足；而過去較少獨立成史的「報導文學」，亦有林淇瀁《照見人間不平：臺灣報導文學史論》（2013）的精彩出版；此外母語文學部分，則有廖瑞銘《舌尖與筆尖：臺灣母語文學的發展》（2013）一書，加上在此之前的林央敏《臺語文學運動史論》（前衛，1996）、《臺語小說史及作品總評》（印刻，2012）、黃恆秋《臺灣客家文學史概論》（新莊：客家臺灣文史工作室，1998）等，母語文學史的累積令人欣喜。

以上，針對葉石濤以來，[96] 臺灣文學史的書寫發展和不同史觀，做了簡單勾勒與說明。可以發現從《臺灣文學史綱》到《臺灣新文學史》、《臺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再從《臺灣詩史》到〈臺灣古典文學史概說（1651-1945）〉，乃至於《五十年來的臺灣通俗小說》、《臺灣武俠小說發展史》的出現，多種文學類型史論和臺灣文學史長編問世，以及《臺灣文學三百年》和續編出版，在新舊雅俗重層視野之下，呈顯了豐富多元內涵，但也存有差異史觀和爭鋒對話情景。究竟，文學與歷史、個人與國家、書寫與政治、語言與族群之間的距離該怎樣拿捏，又如何透過臺灣文學史書寫、重寫與再寫來回應上述命題，仍有待我們日後持續思索。

96 其實在葉石濤之前，連橫、黃得時、王白淵、徐坤泉、廖漢臣、王詩琅、陳少廷等已有文學史相關著述。

四、臺灣文學詮釋框架與研究邊界擴大

如同前述，從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出版之後，二十餘年來，相關著述蠭出，書寫各有特色，史觀別有側重，不僅目前文學史發展階段論，已可遠溯早期原住民神話傳說，次而進入明鄭、清領、日治，以及戰後現當代文學概況；而在創作文類上，除了一般常見類型外，後來出現的臺語文學、客家文學、女性文學、眷村文學、同志酷兒文學、自然生態文學、網路文學等，大抵可從總論式的文學史或分類文學史的基本內容去加以掌握，甚至體會差異史觀背後不同審美取向。但，除了文學類型衍化或次文類增加之外，關於臺灣文學的研究方法和詮釋框架，以及因之引發的研究邊界擴大現象，也值得細究。

對此，回顧過去研究趨向可以發現，從臺灣文學成為新興學科之後，學界一方面透過報刊史料爬梳、田野調查、口述訪談等方式，進行作家、作品論的扎實研究；另一方面則援引西方文學、文化理論，尤其是後殖民理論，重塑臺灣文學的主體性價值，並檢討「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性，形構日治臺灣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文學特質，兼而省思原、漢文學過往互動等，而接續其後，則是以現代性理論觀察臺灣由舊到新、邁向文學現代化的歷程。[97] 在以上進展軌跡中，臺灣文學研究的定位與座標位置，也產生了不同面目。

整體而言，學界研究初期比較致力彰顯「臺灣文學」的存在事實，捍衛臺灣文學的本體價值，而在謀求建構主體性、本土性的努力之後，則是進一步將臺灣文學由本土、本島，延伸至域外、東亞視野，乃至於立足於全球化座標，以及世界文學之中。那麼，努力開拓臺灣文學與研究邊界的策略為何？這其實與研究方法和詮釋框架的設定有關。其中，「東亞」作為一個方法，便曾深刻影響臺灣文學的研究，且具有多重意義：其一，東亞研究的興

97 以上所論，可以參考游勝冠，《臺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臺北：前衛，1996）；陳芳明，《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臺北：麥田，2004）、《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臺灣史觀》；邱貴芬，《仲介臺灣．女人》、《後殖民及其外》；孫大川主編，《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評論卷》（新北：印刻，2003）；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等。

起，除了有利於將研究視域從臺灣本土向外擴展之外，也可使臺灣與東亞（或亞洲）其他國家文學連結，且能善用東亞地區共享的歷史與文化語境，進行更為深刻的比較與本體反思；[98] 其二，由於以「東亞」作為一個方法論興起，故在面對「中國文學」與「臺灣文學」互動發展狀態，便產生了重新解讀與看待的空間，標榜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同樣位居東亞之列，則彼此不再是主次或從屬的位階關係。[99]

而當臺灣文學積極與東亞文學展開聯繫、對話時，其實已經顯現出臺灣文學版圖的位移問題，究竟日漸開闊的臺灣文學座標應當如何釐定？此外，在東亞視野的關照下，臺灣與其他地區、國家文學的比較與連結問題，又該怎樣展開？陳建忠因此進一步談到了「比較研究」方法學的價值：

> 新世紀以來，學院內東亞研究的興起，無疑是把本國文學研究與東亞（或亞洲）其他國家文學連結……同時，也避免一味套用西方理論所造成的非歷史化問題。不過，文學研究除了必須考量歷史層面，當然尤應關切文學的本質問題。從文學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等命題，臺灣文學不僅與東亞國家有關，在許多議題上，也應當與世界文學存在著豐富的「可比較性」。因此，值得深一層探問的是：臺灣文學與東亞，乃至世界文學的異同究竟為何？……比較研究應當是臺灣的文學研究者面向世界舞台時，一種具有主體性的研究姿態。[100]

於此可知，陳建忠會倡議以「比較研究」作為臺灣文學研究的新方法，是在東亞研究的興起風潮中，體會到可在共享歷史和文化語境的東亞之間，從事

98 更詳細的描述，參見陳建忠，〈臺灣現當代文學研究概述〉，《2006 臺灣文學年鑑》（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7），頁 116-118。

99 陳芳明在「本土化」與「國際化」的雙向思考與反省下，指出「倘若以孤立的姿態觀看臺灣文學的話，將難以了解它的意義與地位究竟是在哪裡」，認為若將臺灣放置在「東亞」此一框架下，不但可以建構與凸顯臺灣文學的特殊性與主體性，同時有關臺灣文學長年被中國文學收編的困境，亦能在「東亞」觀點下被消解。換言之，在「東亞」脈絡下，臺灣與日本、中國乃一個「對等」而非「階級」的關係，彼此間無法相互約化與收編，自然亦不存在所謂的主從與優劣。參見陳芳明，〈東亞作為一種方法〉，收於陳芳明主編，《臺灣文學的東亞思考：臺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頁 8-14。

100 參見陳建忠，〈編者後記〉，收入陳建忠主編，《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臺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新竹：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2011），頁 529-530。

比較研究。他甚至認為還可進行文學的普遍性或特殊性議題的比較，乃至於擴及與世界文學異同的比較，而且強調這是一種能夠保有臺灣文學主體性研究的姿態。以上，是極具新意的思考，尤其從臺灣文學主體性出發，這可為1970年代臺灣曾經出現、後來消退的比較文學研究另闢蹊徑，並把臺灣文學與比較文學作了串連。

至於比較研究該如何著手？陳建忠策劃一場聚焦於「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為比較主軸的國際研討會作為演練，後來史書美受邀為論文集撰寫序文，她參照與會學者論文，進而歸納出幾種方式：歷史關連性、翻譯關連性、互文關連性、並置關連性，亦即「用對關連性的探討、挖掘為比較的方法」，簡言之就是針對關連性所做的比較研究。[101] 於此，又引出了一個同樣耐人玩味的「關連性」研究方法論。巧合的是，筆者近十餘年來也有意識地朝此努力。

過去，為了改善臺灣文學因為高度強調「本土性」特質所遭受外界訾議為封閉，以及流於草根性與世界化不足的侷限與憂慮，學界藉由跨界流動的詮釋框架，進以提升臺灣文學進入全球化學術場域的能動性，故當「東亞」、「全球化」等術語紛呈，並成為臺灣文學授課內涵或研究框架的一部分時，就清楚昭顯臺灣文學，已由早期致力挖掘與中國文學差異性之主體建構論，以及確立臺灣文學價值地位的本土論，逐而朝向東亞、全球化的學術場域，嘗試建立起更為宏大寬廣的座標位置了。那麼，為了繼續擴大臺灣文學史的研究邊界，也為了能與東亞、全球化研究相呼應，積極思考新的可能研究範式，顯然勢所必需，於是我選從臺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性」（relationship）去著眼，從臺灣主體位置出發，注意臺灣與其他國家、區域、地方文學具有關連性的細節，特別加以研究，以此既可策略性地將各國、各地文學納為臺灣文學的一部份，也能使臺灣文學順勢走入各國、各地文學研究者視野之中，而能廣為國際所知。希冀透過這種新研究框架與新方法論的運用，隨著考察臺灣文學與其他不同國家、區域、地方文學之間多元而複雜

101 參見史書美撰，吳桂枝譯，〈為比較文學的臺灣文學：代序〉，同上註，頁11-12。又，大抵史氏所提倡的「關係」研究，乃主張從事關係的比較學（comparison as relation），或視比較文學為關係研究，更詳細的說明可參史書美，〈關係的比較學〉，《中山人文學報》39 (2015.7): 1-19。

的「關係性」，進以促使臺灣文學史邊界的擴大。至今，我經由日治時代臺灣通俗小說與世界文學關係、殖民地時期臺日漢文學關係、閩臺文學與文化關係、臺港文學關係等議題的教學，以及一系列論文發表，正持續觀察臺灣文學的輻射、擴散、影響、交流、交錯或交混能力及其相關現象，乃至於問題化的過程。[102]

綜上，臺灣文學晚近除了參考「全球化」、「跨界／跨文化」西方理論，另尚嘗試運用「東亞作為一個方法」、「比較研究」、「關係性研究」等新詮釋框架，促使臺灣文學及其研究版圖的「邊界」向外擴充、移動，且透過此一詮釋機制，賦予臺灣文學作為東亞文學／世界文學一環的契機，這是臺灣文學研究進入教育體制之後的一番積極作為。而除了前列臺灣學界內部自身多元觀點之外，近年來尚有從「世界」著眼的史書美、王德威之「華語語系」論。[103] 此一論述，在王德威、史書美及相關同好的積極引介下，不只在美國、中國引起注意，舉凡臺灣、香港、新加坡或馬來西亞，甚至連韓國、日本，也都舉辦會議或透過刊物、演講予以介紹。上述現象清楚展示了相關知識生產的輻射範圍與漣漪效果，同時也說明了現今臺灣文學學科對此新論述，已經很難置之度外。

---

102 有關個人的「關係性研究」思考背景與目的，初步想法可見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主編，《第八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臺灣文學史邊界的擴大》（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1），序文，頁 3-4；較多說明，可參黃美娥，〈因緣、責任與期許 ── 我的臺灣文學研究之路〉，《國文天地》317 (2011.10): 13-19。

103 史書美「華語語系」（Sinophone）概念的提出，主要是探討華人／華文因「離散」而進入「世界」脈絡的問題。這一方面與英語語系文學與亞美文學等研究進行對話，更重要的目的在於指出，華語語系／文學的研究，不應只聚焦於「中國」此一離散的發源地，也該強調臺灣、馬來西亞等國，在接受華語及其文化的過程中，究竟如何展開一連串轉化、延變與在地化的努力。亦即，從華語語系文學論述出發，除了中國文學以外，臺灣文學、馬華文學實可與其並駕齊驅，且各有一席之地。其後，王德威則在肯定「華語語系」此一概念的立場上與史書美展開對話，有別於史書美從後殖民史觀反省以「中國」為中心的批判，王德威以為所謂的「華語語系」乃「中國文學」於海外落地生根的具體實踐；華語語系的確立，其實正說明了「中國文學」如何藉「離散」跨越國與國之間難以跨越的文化藩籬進而開枝散葉。史書美、王德威雖皆以「中國」作為思考或批判的起點，進而展開華語語系的論述，二者看似相似實則存在著觀點上的差異。以上詳參史書美著，楊華慶譯，《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王德威，《後遺民寫作：時間與記憶的政治學》（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7）。

關於「華語語系論述」的出現，與中國在世界崛起，「中國性」在全球化思潮下已然具有無法漠視的影響力有關，因之促發了諸多學者去重新評價華文文學相關表現、整體地位，乃至於孕育新理論框架的企圖。依史氏所述，她抱持反中國中心論，看重困難、差異和異質的價值，強調要用「華語語系」的多元異質實踐去取代「中文」概念，[104] 並關注「位處民族國家地緣政治以及其霸權生產邊陲的華語語系文化，其焦點放置在中國的內部殖民與從中國移民至各地區後形成的華語語系社群」，[105] 而社群的形成則涉及了三個相互關連的歷史過程，包括大陸殖民、定居殖民與移民／遷徙，更重要的是「反離散」的概念。[106] 至於王德威，面對華語族群形成，因為有感於中華民族文化的花果飄零、零根自植，故對中國性、中國文學的存在，採取了「後遺民」、[107]「包括在外」的立論。[108] 即使如此，二人都認同應該擺脫中國文學體制框架，重新評估因移民產生的弱小族裔華語語系文學價值。

那麼，倘從臺灣立場出發，「華語語系」能否為臺灣文學帶來發展助益與地位提升？尤其，在臺灣文學的發展歷史與研究進程中，原本已有若干西方理論或特殊研究方法論受到青睞，則新興華語語系理論的角色意義為何？甚至，在置身慣見的漢字圈研究、漢學研究、世界文學研究之後，這個理論是否能引發更多文學研究的新想像、新境界？有一點不可否認的是，過去為了讓臺灣文學能與國際接軌，研究者不斷在臺灣「內部」努力，或透過西方文學理論的挪用去拉近與國外的距離；或是在研究方法上，策略性注意臺灣文學與域外跨界、交錯的接觸狀態，或分析彼此之間的可能關係性，或者進

104 參見史書美著，楊華慶譯，《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頁 18、60。

105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頁 9。

106 同上註，頁 14-18。

107 王德威近年除了「後遺民」、「華語語系」論述外，尚有「抒情傳統」論述提出，如《現代抒情傳統四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臺北：麥田，2017），關於「抒情傳統」對於臺灣文學研究能引發怎樣的效能？最新成果可以參見鍾秩維，「抒情與本土：戰後臺灣文學的自我、共同體和世界圖像」（臺大臺文所博論，2020）。

108 參見王德威，《後遺民寫作：時間與記憶的政治學》（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7），頁 47-48；〈「根」的政治，「勢」的詩學：華語論述與中國文學〉，《中國現代文學》24 (2013.12): 16。

行跨國比較研究。也就是說，想要讓臺灣文學迎向世界，邁向國際，以臺灣為中心外向輻射、進行闡連（articulation）的研究方法，其實是本學科發展多年的不斷嘗試。然而，這種從內而外的推展，或者更可能是種緩慢的滲透，其實移動的步履十分吃力；但，今日因為美國學界華語語系論述興起，反倒有一股發自臺灣「外部」的力量，逕將臺灣直接納入「華語語系」中，故而臺灣文學得以和其他華語語系文學，一起被捲入、推移到西方世界裡。則如此，我們自可將之視為一種助力。

五、結　語

追溯過往，臺灣文學學科之所以正式進入大學教育體制，以及各校建置臺灣文學系所的風潮，實得力於國家權力的介入、鼓勵與推波助瀾，如此遂使臺灣文學學科的體制化過程，充滿文學政治的尷尬。保護傘下的教育生產，實際存有雙面刃的危機，學科的主體性意義不免飽受外界質疑；連帶致使臺灣文學知識體系的建構，在具備「發現臺灣」的自覺性的同時，卻也弔詭地在一開始就得背負著「先天不足」的悖論。

不過，本文藉由多種專著、學位論文或單篇論文，鳥瞰臺灣文學學科進入體制化之後的研究概況，可以發現二十多年來，以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為基石，學界積極開發新議題、新領域的努力面向，不僅論著內容繁複可觀，臺灣文學史邊界更已擴大許多，且研究視角屢見新變，甚或不乏對話交鋒，是皆表現了眾人對於臺灣文學研究的熱情與慾望。

而就研究趨向而言，空間、殖民、女性、鄉土是過往常見論域，長期獲致耕耘與開拓。再者，日治時期通俗小說研究、殖民地臺日漢文學，則是臺灣古典文學研究新興範疇。至於新鄉土小說研究、華語語系論述，無疑成為晚近現當代文學領域最為關注的話題。當然，還有隨著文學史書寫型態的多樣化，以及史觀分歧現象，在在提醒留心「誰」在撰寫？如何詮釋？為何要寫？種種問題的思辯。此外，從「本土論」、「東亞作為方法」、「關係性研究」到「華語語系」，各類詮釋框架的挪用與調整，莫不顯示素以在地性格為重要標記的臺灣文學學科，越來越有向世界推進的雄心壯志。

此外，在回顧的過程中，也會發現所謂「臺灣文學」在目前學界廣為

流行的領域，其實是現當代文學，多數研討者的目光也集中於此，而其他古典文學、原住民族文學、母語文學尚待更多人力投入，而民間文學則甚為窘困。那麼，此一現象暗示了怎樣的訊息？在臺灣文學學科內，現當代文學領域的獨領風騷，是否指涉此領域的教學安排，其實存有過度集中的現象，導致對其他範疇的教學與研究有所忽略。又，一個臺灣文學研究系所的畢業生，究竟該具備多少的臺灣文學史知識才算完足？哪些類型的課程一定要學習？要擁有何種認識論、方法論以及學科倫理觀？上述問題牽涉了研究與教學面向規劃，相關問題有待解決，學科的特質與特色才能獲得真正彰顯。

回顧來時路，廿年辛苦不尋常，臺灣文學研究十分熱鬧，充滿活力，相信所蓄積的動能，將使後續前進的步伐更為穩健，前景令人期待。

Research on Taiwan Literature: A Review and Outlook

Mei-er Huang*

Abstract

As an emergent academic discipline, "Taiwan literature" began entering education systems in the late 1990s, but despite the successive establishment of related academic departments and institutes, it has incessantly faced challenges concer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knowledge system. These challenges have ranged from early inquiries into the definition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difficulties grasping the contents of its knowledge system to questions over the writing and compiling of its history. Moreover, efforts to apprehe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ized knowledge have been called into question, and pressure has been felt to consider whether the discipline has become too narrow and limited as well as how it can quickly meet the goal of being globalized. In particular, at the onset of its establishment, Taiwan literature was able to assist in processes of strengthening national power, gradually leading to a systemization brimming with the awkwardness of literary politics. But the production of education under this protective umbrella has in reality been a double-edged sword, resul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knowledge system of Taiwan literature that is conscious of "discovering Taiwan" while simultaneously being paradoxically burdened by "inherent deficiencies." Regarding this, following extensive efforts and over twenty years of fruitful research, scholars have sufficiently proven the necessity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discipline as well as the value of its continued development. The

* Mei-er Huang,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ent article attempts to summarize and comment on the above matters, and more specifically, uses Ye Shitao's 葉石濤 (1925-2008) classic work *Taiwan wenxue shi gang* 臺灣文學史綱 (*An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Taiwan Literature*) as a starting point to trace the various directions ardently pursued by academia following its publication in 1987. A number of topics are touched upon here: the deepening and expansion of scholarship in its entirety; newly emergent research topics and those that have garnered special interest; as well as frameworks, methodologies, and the expanding of boundaries of research, which have extended the discipline of Taiwan literature from the localized to East Asia and the world at large.

Keywords: Taiwan literature, literary knowledge system, East Asia, world, expanding the boundaries of research